
一五一十周刊
NO. 125
2013年 9月27日
空间
在日子里流淌
月末版"时间与空间"第一期
論壇
我在中國
Co-China

# 编者的话

月末又至，一五一十周刊将开启一个新的月末版系列。在前两个系列“精神生活”和“感官世界”中，我们从个体出发，在内省的层面探讨人的精神生活和感官体验。现在，我们将向外延伸，在“时空”中穿梭，探讨我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以及人与时空的关系。

时空是生命轨迹的两个重要维度。我们可能趟着时间，一次又一次变换空间；也可能守着空间，感受时间的流逝。纵横经纬之间，人生所有的活动、经历也就立体了起来。作家聂华苓曾这样表述自己的一生：“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每一个时空下，都是一辈子。本期周刊，我们从最小的范围开始，拆解、感受周遭的日常生活，揭开空间的盖子，摸索时间的纹路。接下来的几期，我们会进而扩大半径，在旅行、移民等场景中，继续“时空”探索。

日常生活中的四个场景经常出现：居住的社区空间、工作空间、交通空间和公共空间。这些空间的规划设计、建筑风格各不相同，时间在其中做出标记，凝结成记忆。同时，空间的呈现和功能，也决定了当下的时间如何度过。在每个空间中进行的活动，都有其相对的时间单位。

在宜兰，建筑师黄声远和他的团队，设身处地的规划、一砖一瓦的建造。希望可以经营到理想社区：“她可以让小孩安全地骑车，进出政府机构像进出自家后院，而且，发生过的故事，以后还都找得到痕迹。”当大部份乡村在五年、十年规划中焦急地进行城镇化，宜兰却有很多事可以想一想，再想一想，才做决定。居住在城市的人，同样惶恐，因为看到记忆被斩断后废墟一样的未来。欧宁的文章考察了重庆、香港、台北三个城市在更新过程中所出现的对抗事件，以及事件背后的问题。当生活空间被发展的逻辑绑架，人们只有拖住时间，才能守护那些珍贵的历史、文化、情感。

在办公室除了工作，一天之中还可以有哪些活动？小憩、浅酌、放松身心，俄罗斯的这家网络公司甚至还有化妆台、按摩椅、健身房等等。除了丰富设施，色调、通风、绿色植物，都是让办公室时光愉悦起来的重要规划。

当工作空间更开放，合作、创意碰撞的机会也会增加。起源于美国的“共享工作空间”模式正在越来越多地方受到欢迎。当然，休闲、共享，这些都是工作空间的新尝试。张黎的文章回顾了 1890 年以来的百年岁月里，“办公室”作为“现代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原型场所”，布局设计的潜在逻辑：办公室的一天，必须是有效率的一天。

每一次在交通空间的主题总是等待，等飞机、等地铁，等火车，下一个地方才是目的地，这里只是中转站。短则几分钟，长则数小时，人们总是通过各种办法打发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时间。作为一个热爱旅行的人，阿兰·德波顿耐心的在机场里进行了一次“小旅行”，从行李提取处，到候机大厅，每一个区域都带来了新的感受。而潘国灵则从地铁站的广告、商场中，体验到“香港特有的地铁景观，流露着香港的个性——商业与艺术互相紧扣、即用即弃、快起快拆，一种高度资本主义、资讯超载、拟像充斥的后现代城市气质，于地下空间中任意散发。”

当人群需要聚集到一起，也许是休闲娱乐，也许是政治集会，容纳人群的公共空间变得非常重要。网易 2009 年制作的专题中，回顾了中国 60 年来公共空间的发展变化。“1978 年以前，在中国人的公共空间里，主导的人物是领袖、干部和群众，压倒一切的活动内容是宣誓、口号和报告。那时候的公共空间，其实只是‘公家空间’。改革开放以后，在公园、街道等‘公用空间’里，群众的自发性活动开始回归，而且花样繁多。”同为“公”，公家空间、公用空间和公共空间，背后是参与者公民主体意识的变化。刘冉的文章，通过对香港反国教运动的观察，分析新政府总部的空间设计如何消解分割示威力量。香港每个月几乎都会有公民集会行动，空间的掌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

在你阅读这期周刊的时候，那些属于你的日常生活空间，或许也正在发生某些隐秘的变化，你不妨追寻并记住它们，作为你回顾人生的线索。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 目录















# 【居住社区】

里奥妮亚城每天替自己换新装：居民每天在新被单和新床单之间醒来，用刚解开包装纸的肥皂洗脸，穿崭新的衣服，从最新型的冰箱里拿出未开的罐头，听最现代化广播台最新的音乐。

弃置路边的是昨日的里奥妮亚，裹在洁净的塑料袋子里等待垃圾车。除了一筒筒挤过的牙膏、坏电灯泡、报纸、瓶罐、包装纸之外，还有锅炉、百科词典、钢琴、瓷器餐具。要估量里奥妮亚有多么富饶，单单看它每日的生产、销售和购买量是不够的，还要同时看它每天为了腾出空间安置新制品而丢弃多少东西。于是，你开始揣测，里奥妮亚真正的乐趣是所谓享受新鲜事物呢，还是抛弃、清除、细净经常出现的污秽，事实上，人们欢迎清道夫就像欢迎天使一样，他们在充满敬意的静默中搬走昨日的遗迹，这似乎是足以激发宗教虔诚的一种仪式，不过也许因为人们丢弃东西之后就不愿再想它们。

谁都没有想过，他们的垃圾每天搬到什么地方去。运到城外，当然，可是城市年年在扩大，清道夫必须走远一点。垃圾量增加了，垃圾堆也高了，在更宽的周界里层层堆起来。而且，里奥妮亚制造新物品的能力愈进步，垃圾的质量也愈高，经得起时间和自然现象考验，不发霉，不燃烧。里奥妮亚周围的垃圾变成不可摧毁的堡垒，像山岭一样从四周耸起。

结果是：里奥妮亚抛弃得愈多，积存的也愈多；它的过去的鳞片已经熔合成为一套脱不掉的胸甲。城市一边每日更新，一边把自己保留在唯一可以确定的形态里：昨天的废物，堆在前天和更久远的废物之上。

里奥妮亚的垃圾可能会一点一点侵入别人的世界，不过，在它最外围的斜坡之外，别些城市的清道夫也推出堆积如山的垃圾。在里奥妮亚边界之外，整个世界也许都布满火山口，各自环绕着一个不断爆发的城市。隔开敌对的陌生城市的，是受侵蚀的堡垒，靠着彼此混杂在一起的瓦砾互相支持。

垃圾积得愈高，倒塌的危险愈大：只要一个铁罐、一个旧车胎或者一只酒杯滚向里奥妮亚，就会引起一次大崩陷：不成对的鞋子、旧日历、残花；而城市不断企图摆脱的



过去以及混杂着邻近城市的过去，就会把它埋葬得干干净净。这样的一次大灾劫会把肮脏的山岭夷为平地，抹掉每日换新衣的一切痕迹。在附近的城里，他们已经准备好开路机，等着铲平这片土地，向新领地扩展，把清道夫驱使得更远。

——摘自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 10-1 张洁平：朱涛、黄声远对谈：当宜兰遇上田中央（节选）


张洁平：香港《号外》杂志副主编。

> “他花十年的时间说服台电拆去围墙、整理社区；他用十三年的时间去联结一栋社会福利馆、一座有屋顶的路桥和宜兰河上的步行栈道，为了让严整的机构打碎淹没在环境里，让地貌可以被意识到，让人们可以自由出入；他也在各个建筑项目的缝隙里悉心布局了道路，让它们缩小、曲折、安全，让老人和孩子有更舒适的步行。”

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每一个建筑都好像一段乐章飘在街巷里，期盼着下一段的到来。

这是在宜兰看建筑师黄声远的房子时常有的感受。

一个冬日寻常的下雨天，黄声远带我们信步走进宜兰的田野街巷，看他和伙伴们在地二十年做过的大大小小的房子。他脚步不停，语速飞快，手势悬在半空，一路走，一路连，几乎没有放下来过。一座房子，连上一段路，然后是一座桥，旁边再一座桥，隔开几十米，再一条路，再一个房子……如今的宜兰，遍布黄声远和伙伴们的建筑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公共建筑，它们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街道、稻田与河流之间，每一个点都以未完结的姿态，继续生长，彼此呼应，勾连起一个流动而充满可能性的公共空间。

2012 年 12 月，黄声远和他带领的“田中央”联合建筑事务所的最新作品，宜兰罗东文化工场，获得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公民建筑奖。这一年，黄声远 49 岁。



在领奖现场，黄声远温柔地向这座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县城宜兰致敬："每一个小地方都需要相信自己能够往前连接历史，往后建构传奇……宜兰就是宜兰，不疏不密，城不是乡的下一步，乡也不必为了城扭曲……田中央有幸身在其中。"

1993年，台北出生、长大的黄声远，带着耶鲁大学建筑硕士的学历和美国著名事务所的工作经验回到台湾，一头扎进宜兰，一待就是二十年。他与镇里上上下下打成一片，城镇乡大大小小的设计工作他都做，盖房、修路、做景观、做规划。他的工作队伍，从最初的一个人、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将近三十人。因为大多数工作都是在田野之间完成，伙伴们亲昵地称呼自己的团队为"田中央"。

黄声远和"田中央"一直坚持只做"离宜兰车程三十分钟以内"的项目。

"我们就在这里，就住在宜兰"，黄声远坚持，"设身处地"才能最大限度地发现使用者需要，而这一点对于公共建筑，至关重要。很多建筑师事务所从一个专案从开始到完成只见甲方两面，第一面签合同，第二面交货；"田中央"不同，他们和建筑的使用者和建造者生活在一起，随时待命，随时到达工程现场，与施工队一起讨论，发现需要修改和弥补的地方，时时调整。除了做设计，"田中央"的成员甚至还熟悉砌墙、木工或者焊接技术。

在黄声远看来，要"从生活细节往上构架"，一座城市才不会无序地扩大，而只有"在地"，才可能细细打磨出这些符合理想城市的生活细节。

他喜欢在宜兰四处走、四处看，看见哪里不对劲，就想说，这里可不可以改一改。这些"不对劲"，有时是人行道的位置，有时是一栋房子开门的方向，有时是被马路阻断的公共空间……如果暂时没法改，就存着念想，一旦有哪个专案涉及，早就写好的计划书立时交上，念想才可能变成了现实。在公共建筑严格的预算和繁复的审批和中，黄声远和伙伴们早就习惯了以十年为计时单位的工作。

他花十年的时间说服台电拆去围墙、整理社区；他用十三年的时间去联结一栋社会福利馆、一座有屋顶的路桥和宜兰河上的步行栈道，为了让严整的机构打碎淹没在环境里，让地貌可以被意识到，让人们可以自由出入；他也在各个建筑项目的缝隙里悉心布局了道路，让它们缩小、曲折、安全，让老人和孩子有更舒适的步行。黄声远说："人们一开始会好奇我到底要建什么，怎么这么多年也建不好。我慢慢让大家明白，我们做的不是项目，也不单单是在建房子，而是环境改造活动。"

二十年里，宜兰县换了四届政府，政党轮替了两次，"田中央"的"专案"始终不结，建筑师也迟迟不走。人们送他们一个戏称："铁打的田中央，流水的县政府"。

黄声远说自己越界做了很多规划的事情，在宜兰县政府一个一个单独的项目里，埋下



了脑海中早就有的理想城市的规划图景。他相信不管有多少麻烦事，自己终究能做成，因为“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而“政客一定会下台的啊”。

什么是黄声远心目中的理想城市？他这样说：“她要可以让小孩安全地骑车，进出政府机构像进出自家后院，而且，发生过的故事，以后还都找得到痕迹。”
那么，什么样的建筑才可以构成这样的城市？

2013年初，我们邀请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建筑评论家朱涛与黄声远对谈。黄声远和田中央在宜兰的建筑实践被视为华人世界公民建筑的典范，他们的经验是什么？又是什么机缘，让黄声远和“田中央”扎根宜兰？他们的经验，能够在其他地方复制吗

**连接与可能性**

朱涛（以下简称“朱”）：你被公认为台湾“在地建筑师”的代表之一。很多同行都佩服你在宜兰持续近二十年的空间实践，帮助强化了宜兰地区的地方身份和特征。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你的工作：一来，你一直在建筑和地景语言上努力探讨和表现宜兰特色；二来，我觉得你的工作更富特色的是，你不光设计单个的房子和地景，还经过多年努力，把你那些分布在宜兰各地的作品，利用各种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桥、公园等，逐渐都串连起来，形成一条条连续的地景廊道。有些地景廊道的伸展范围已经相当大了，有了区域性尺度。但你还在继续“栽培”，让它们像超级藤蔓一样，持续生长、蔓延，连成“地景网络”。你为什么老是连来连去的？

黄声远（以下简称“黄”）：有一个原因：台湾的公共政策。你做完一个房子，没有什么机会去修正它。一个房子做了以后，其实是有生命的，它会坏掉，也会因为我们的年幼无知，因为我们被厂商骗，材料用得不对，对人的估计也会错误……既然它一定会在一个什么地方是坏的，那我后来想出个方法应对。比如西堤屋桥，后来修过很多次。开始犯了很多错误，材料不了解，漆也不对，后来我知道，要面对时间这个事情，要有一些策略。大多数的材料，最好还是它原原本本的材料，凡是有套路的建筑系统里面的一部分，通常都会有事。因为建筑系统本来设计得就是要更替的，这样才可以花钱。可是政府的预算是不会有后面那一笔的，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在它旁边搞另一个 project 出来，这个 project 可以伸手出来去救原来那个。因为你不可能花钱再去改原来那个。真正认识到设计的核心部分，取得一个重大价值，细节慢慢修正，这个在私人住宅可以的，但是公共建筑根本不可能。我只好在它旁边再搞一个什么东西。没办法靠得很近，就得离稍微远一点，中间再搞一搞，我才有机会让所有事情是在一个永续的状态。我们开始也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改，所以需要实践，需要动手



做才知道。所以我都是逮着机会就做做做，做的过程里会有体验。所以说我“连来连去”，动机跟这个有关。

朱：你光说用后一个修复前一个也太简单了……比如你修西堤社福馆，一栋建筑觉得不够，非要从基地里伸出一个西堤屋桥，超出边界，跨越公路，到达宜兰河边，在河边修一个观景台，然后继续在过河的混凝土桥旁边修人行道桥，一直把“气”贯通到河对岸——这显然不光是为了修复自己，而是为了两岸的连通。城市空间的打通，我觉得你是一以贯之的。可能一开始是做单个建筑物，但不知什么时候，你开始 zoom out，开始画区域空间联结，想生发出更整体、更大尺度的能量。

黄：我有个奇怪的个性，你看我都不喜欢跟人家约时间。我也不喜欢被绑住。一旦觉得被卡住，就很不舒服。比如西堤屋桥到了堤防上，面对着宜兰河。我觉得河比湖厉害，呜地就出去了。做宜兰河的时候，我才知道水是这样流的，水有削切面和堆积面，削切和堆积，我想让两岸的不同被感觉出来，想要让这个河被意识到，而想要感觉出来，人最好实地去体验。

那个步行桥（津梅栈道）真的做了好多好多年，都不知道怎么算它开始的时间。我一开始异想天开，说可不可以装个电梯，一个按钮，呜就划过去。还想过在河里拉筏。但（这里归）河川局管，几公里几棵树都管得紧紧的，所以很多最初的设想，技术上被调整成今天的样子。（当时）怎么一脚踢，踢进去，我们也不晓得。（能做的）就是含在嘴里，不要放，一直关注着。郝柏村上台，“中央政府”要扩大内需，一下撒钱出来，地方政府一下不知道钱要往哪里花。可我们做设计的一早就想好，做社福馆时就想，这里通不过去有点难过，于是伸一只脚在这里，设计先做好，等扩大内需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把图给你了，弄不好大家高兴把它给做了。可是要做横跨宜兰河的桥，要花更多的钱。当时赶上一个“竞争型城乡风貌”的热潮，全台湾讲究工程要减量，所以一定要看不出来，才要得到钱，如果是凸显性的就要不到钱。所以那时我们想到，在河旁边做一个裂缝，那个裂缝其实就是椅子，可以坐，我想象中秋节，河两岸的人可以一起看月亮……一千人一起看月亮，那是多么壮观！

我们这个年代的愤青，你总是看到一样的努力产生不一样的命运，就觉得不爽。有一个议员，每次去申请水泥桥，他只要改变桥的弯度，下到哪条街，那条街马上就被改变了，对面的能量通通被吸过来，乡村的能量全部被吸进城市，没有倒灌回去。我一直觉得，要想个什么办法，让这些能量倒灌回去。

这些思路，老实讲没有多少头绪。我们的人生就只有那么点时间，能够让它挣脱现在的、闷在那里的感觉，能够动就先动。我纯粹是想要挣脱一点什么东西，没有深

思熟虑。可是每件事情我们都没有把它做绝，都只做了一个头，我会很小心地保留可能性，因为知道随时可能有新的东西、新的计划出来，只做一个头，必要时还可以扭过去。这是蛮有意思的。

朱：你这里说的是策略上可以很灵活，每一点都是比较开放的。但是“连”的这种意识，你不妨好好想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描绘的动作都很生动，比如“不愿意闷在那里”、“疏通”、“倒灌”……这种对“空间能量”的形象化体验和描绘，我觉得很重要。刚才你提到，一条高速公路修过来，整个区域空间格局全变了，老城可能迅速衰落，郊区可能迅速修建起新区；很多河流在历史上曾是重要航道和地景廊道，但铁路、公路一通，它们便迅速没落。你的工作室最近就在帮助宜兰修复过去的水道、水网……不管具体策略上多么灵活多变，或者迟疑不定，但是这种“连接”意识的确不是典型建筑师的思维，因为建筑师的做法是受片段化土地开发模式局限的：单个地块划定边界后，独立业主在里面该修多大的建筑，你建筑师给我修出来……

黄：对，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干建筑师了……

朱：通常建筑师对城市的地面、水流，所有的大尺度的连续性，实际上是不在乎的，他也没责任、权力去在乎。但你这种“连接”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东西你觉得“闷”，要往外长、往外冲，一连二十年，发现好多东西连起来成了网路。其实在你这里，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地景设计，是合在一起了，甚至从城镇规划到区域规划都在做。

黄：你讲得有道理。我曾经出了一次台湾的建筑师考试的题目，一个题目让所有人都大为惊骇。我是反过来出的题，我照了照片，里面有一些房子，请建筑师们做出它们的基地。让他们想，这个基地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应该要有什么功能。很多人是完全做不出来的。

朱：这让我想起来，我的导师 Kenneth Frampton 作为建筑史家特别重视地景。他有时说建筑不可能了，只有整体的地形、地景设计（landform，landscape）才能修复城市空间的连续性。因为当代建筑就是一个个孤立的 object。传统的城镇是有连续性的，它通过街道网、通过低密度的城市肌理实现空间的连续性。但现在的私有开发，就是划分地块，各自往上修房子而已，只剩下地面才可以维持或修复连续性。通常的建筑师，做房子有红线。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有红线？是不是宜兰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上来就根本看不到红线……

黄：我们大部分的 project 都是这样……比如礁溪林宅，看起来是个住宅，可它摆明了又不是一个住宅。主人一直跟我说，他要回妈妈家去吃饭，他们村子的人也可以

统统到他们家来……他家根本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来到宜兰后，我才发现，其实不是有产权限制，公共性是可以渗透到我家客厅里面的。这些人确实在一个熟人社会里，所以空间都是流动的。（朱：不受产权界限影响）。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感受：你去主张你的产权，是一种丢脸的行为，是在那个社会会被唾弃的行为。这确实是宜兰的经验，我在台北和台东就没这样的经验。我非常讨厌他们要在兰阳溪口做什么社区农地重划。下一场大仗我不惜跟县政府翻脸——它要在兰阳溪口做社区的农业重划，就是为了取得公共设施，把它划出一些地块，可那些地块一定会是台北人买啊。那么漂亮的地方，台北人一定可以出一个比较高的价钱拿下来。那是咽喉之地啊，三条水汇合的地方，宜兰最有象征意涵、最敏感的地方！那个地方怎么可以把它拿来，规划得让它有被私有收购的可能？这是伤害我感情的，理论上政府应该买下来，然后去补偿那些人，替大家贡献所负担的损失……我好不容易选择做建筑这一行，就是我还以为建筑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一些事情。老是觉得，搞空间的人可以让我们解放。去当建筑师和这个有关，结果自己把自己绑住了，只能在框框里做……

朱：这涉及一个空间政治问题。我们在说“连接”，连通的主要是开放的公共空间。你好像特别不赞成宝贵的公共开放空间被私有开发占据。比如，你宁可在宜兰火车站门前广场，花巨资修“丢丢当”森林，占据地盘，彻底杜绝以后私有资本开发的可能性——这种意识是怎么来的？大部分的建筑师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在产业链里，建筑师往往处于很下游的环节，在开发商决策的下游。

黄：我非常不喜欢在别人的下游。总有一个方式我要翻到他上面去。我如果是公共，我就最大。谁会比“公共”更大呢？而且，我觉得“空”最大。好多地方给了我们这样的经验，反正趁机会，只要他一不注意就把它挖空。通常政府不会让你“空”的，有空地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塞”东西进去。政府想要制造很多“面包”——感觉上我做了很多事，可以被数得出来的东西。可是如果是这样子，假设我们罗东文化工场盖一个房子，里面有很多功能，换了一个党上台，新上台的会说，哟，我们再盖一个把它包起来——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好险的是，换党的时候要降低预算，我们就趁机把上面的给它铲掉。你看到就像个废墟一样，整个上面一层完全是空的。拿掉了之后，我觉得好高兴。从此以后它就自主了。空了以后，就没有人敢再让它往上加东西。我也赶快去计算，把结构的强度降低，让结构的强度不能再支撑盖回来。我很怕下一任政府想要再加盖什么东西。保持它是空的，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没品位到，硬要加盖一个什么东西。掌握了这个“空”，就掌握了一个时间上的优势。因为你不管怎么换，这个东西先护住了，掌握了这个“空”，不管怎么变，都不会变得太多。

朱：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理想中的公共空间，一是绝对不能被私有开发占据；其次是，即使是公有的空间，你也希望，从剖面上、从地面上，尽可能留“空”来营造无穷多的可能性，而不要被限制死？

黄：对，还有我觉得用它的人都需要付出代价，都需要努力，要奋斗才可以用到它。不能说分到他就是他的，“公共”不是这样分的。我总喜欢在“空”里引入不稳定的软体，这让很多人不愉快。像文化工场的美术馆做成一个漂起在三楼的东西。美术馆负责人非常生气啊，他说我们的画放在一楼都没人看，放在三楼谁要看啊？我觉得说，你说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的画根本不好，我不要你在一楼随随便便给人看啊。放在地面就完蛋了，初一到十五全部排满，一群野狗扑上去，完全动弹不得，还占了一块地，把地气的那个“通”也破坏掉了。所以我直接把文化馆放到三楼。所有人都不理解我在搞什么。

朱：它也不能妨碍其他的可能性——像你说的三楼的画廊，上面在布展，下面还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事情。宁可把这个“空”给未来，给各种其他的可能性。

黄：对。忽然有一天它不是画廊了，不是就不是吧。如果一开始做死了，就很惨。这个思路按王俊雄（台湾建筑评论家）的解读是，我们这种出生在“戒严”时代的人，骨子里有恐惧，怕什么事情被人家说了算。他觉得说这是“戒严”时代走过的人心里的伤痕。

（本文有节选，全文刊载在《东方历史评论》第2辑，文章链接：
http://history.orientalpatek.com/newsdetail.aspx?id=435)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 10-2 欧宁：城市更新及其对抗


欧宁：诗人、艺术家、策展人，文学杂志《天南》主编，2011 年发起致力于乡村建设和共同生活实验的“碧山共同体”计划。

“

城市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保障人的安全和权利。特别是当城市无法适应新的要求，面临衰败，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而要推行更新运动的时候，它更加要聚焦于人——城市的居民身上。城市更新运动不像在迪拜填海造城那样，可以满足建筑师或城市规划者对于“零城市”和“零语境”的自渎，它不仅是对现有城市物理空间的重整，也是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再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将触及不同利益集团在过去漫长时间内所形成的固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更新必然伴随着对抗。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变革和冲突，在处理这类对抗的过程中，谨慎使用公共权力，平衡和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让他们在新的城市空间中安居乐业，能平等分享到在城市中的各种权利，进而对城市产生精神认同并履行市民义务，城市才可真正获得永续的生命。

”

### 城市的生与死

人终有一死，但都相信自己的城市不朽。千百年来，如果不是战乱、自然灾害或其它不可抗力的冲击，人们看见的城市总是生生不息，藉由物质的累积和精神的传承，成为延续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载体。然而，与人们的愿景有违的是，城市事实上也是个有机体，同样有其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只不过其时间更漫长，过程更复杂，超出了人短暂一生的视野。城市并不仅仅是个布满街道和建筑的物理空间（就算是物理空间也面临时间的侵蚀），它还纠集着世代繁衍的生命，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动荡和郁结。城市的生与死，一直难以定义，充满了争议：人们发明城市规划这个专业，原本是希望它能对城市进行周密的“生涯”规划，有效控制和救助城市的衰败，从而能延长城市的寿命直至永恒，但不幸的是它常常被人们称



为城市的杀手；有人认为发展商们投入资金是为城市添砖加瓦，而历史保护主义者则认为他们唯利是图，抹杀城市的集体记忆并窒息城市本来的活力；有人认为建筑师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但有人也批评他们耽于自己的梦想，把城市当成白板(Tabula Rasa)，随意刷改自己的设计，罔顾城市使用者的死活……

简·雅各布布斯在其 1961 年出版的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以一个普通市民的姿态，猛烈抨击以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勒·柯布里耶(Le Corbusier)的"光辉城市"（Radiant City）和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的"城市美化"(City Beautiful)为代表的城市规划思想，这些思想被她斥为"伪科学"，表面上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战后的美国曾盛行一时，成为政府规划官员、投资银行、发展商以及学生的专业标准和金科玉律。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城市规划，忽略城市多样性混合并存的实际需求，按照不同功能对城市进行秩序井然的分区，它们之间除了靠快速道路作为连接之外互相孤立，建造大面积绿地花园林荫道是为了视觉美观而不考虑人们的实际使用，认为步行街道是一种空间浪费，对市中心的贫民窟深恶痛绝，通过大力发展郊区来舒缓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并置换其土地，把穷人赶走，对不同阶层实行隔离居住。简·雅各布布斯把这种规划看成是对城市的洗劫，它"抽空了城市的精华，大大损伤了城市的元气"，使不该衰败的城区走向衰败，导致了"城市之死"。(1)

在 1962 年一篇虚构的文章《城市破坏业株式会社》中，矶崎新也把勒·柯布里耶及 CIAM(国际建筑协会)影响下的现代主义城市描绘成绞杀生命的庞然大物。例如，它制造的交通事故轻易取人性命，把死亡变成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大大降低了传统私人谋杀业的血酬成本，令职业杀手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在专业尊严方面蒙羞受耻。于是杀手 S(英文 Sin，中文罪的缩写)决定组成"城市破坏业株式会社"进行报复，对城市实施"物理性破坏"，"功能性破坏"和"意象性破坏"。在此文的续篇《流言城市》（写于 2004 年）中，矶崎新认为这三方面的破坏根本无须任何公司代劳，因为城市一直在自我毁灭，他举 1995 年神户大地震、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以及东京的一些自杀式的城市规划为例，说明 40 多年前他的预言均被一一实现。"城市之死"的意象一直萦绕在矶崎新的思想中，他 1968 年参加第 14 届米兰三年展的作品《电气迷宫》把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废墟、日本浮世绘中的饿鬼以及未来建筑的设计拼贴成一幅幅人间地狱的景像，讽刺人们对未来城市的盲目乐观，并发出了"废墟正是我们人类未来城市的形态，未来的城市即是废墟"的宣言。(2)

在 2007 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中，马清运提出了"城市的过期与再生"的



议题，这是关于城市生死的另一种表述。他的观点是，既然城市有其生命周期，会经历青年、成熟、衰老甚至消失的过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就应放弃对永恒的追求，承认过期和失效，允许试错和擦改，在不断的调整中实现城市的再生；城市应向农业学习，农民在某个季节里播种耕作，它的收成好坏并不影响来年的计划，他会反复劳作，总把希望留给下一年，这被马清运称为农业的精髓，代表着未来城市的方向：“农业的秩序是理性生活的最高境界，农业的理想建立在未来对现在的删除上”，农业文明有一天将会复兴，世界上会出现“什农城”(Agricity)。(3) 而在 2008 年 1 月 31 日举办的一个关于此届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饶小军则提醒人们警惕马清运的这个乌托邦思想，因为城市的生长需要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沉淀，更需要文化的保存，绝不能随便像“割麦茬一样把建筑割掉重来”，马清运所提供的“城市再生”的动力是一种未知的能量，是非常缥缈的东西，它将导致对现实城市的毁灭。(4)

是生存，还是毁灭？城市的成长、衰老和亟待更新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如何更新、如何再生却争论不休。在我看来，“过期”是一个物化城市的概念，它把城市只等同于会变质发臭的食品、会失效制造意外的橡胶安全套和在风雨侵蚀下斑驳剥落的危墙，而把生活在其中有血有肉的人排除在外。它反映了建筑师的职业病，眼中只有钢筋混凝土，脑中只有草图和狂想；它也表达了建筑师在其执业实践中的利益诉求，如果城市快速过期，它的重建对建筑师的需要将更频繁。由于对“过期”的宣判有赖公共权力去实现，马清运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公权现状的礼赞：“可擦改的规划才是真正规划。而西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已经把这种理想完全抹杀了，当然也就没有投入智慧。但中国仍有可能！中国是规划理论和程序刷新的真正环境。因为土地是公有的！”(5) 至于农业的梦想，马清运不是看重农业聚落作为人类居住方式多元化的另一种选择以及对过度城市化的有益提醒，而是学习了它的季节性生产中对土地的一茬接一茬的反复使用，以这种观念去构建的城市乌托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矶崎新曾总结过，越多乌托邦的建议，城市灭亡得越快。勒·柯布里耶的城市乌托邦曾经非常诱人，倘若在与权力的共谋中变成现实的话，它将是人类的大灾难。在各种观点中，还是简·雅各布布斯的最具说服力和穿透力，因为她曾在美国各大城市中走街串巷，以一个母亲的目光，去考虑街道的安全，人们生活的舒适满意程度以及生活在城市中的各种权利的保障。

城市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保障人的安全和权利。特别是当城市无法适应新的要求，面临衰败，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而要推行更新运动的时候，它更加要聚焦于人——城市的居民身上。城市更新运动不像在迪拜填海造城那样，可以满足建筑



师或城市规划者对于“零城市”和“零语境”的自渎，它不仅是对现有城市物理空间的重整，也是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再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将触及不同利益集团在过去漫长时间内所形成的固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更新必然伴随着对抗。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变革和冲突，在处理这类对抗的过程中，谨慎使用公共权力，平衡和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让他们在新的城市空间中安居乐业，能平等分享到在城市中的各种权利，进而对城市产生精神认同并履行市民义务，城市才可真正获得永续的生命。

**庶民的胜利？**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 1978 年始，至今已近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为了顺应整个国家经济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再向制造业、房地产业、服务业、文化和科技产业的转移，城市化运动越演越烈。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7 年发布的报告称，2006 年中国城市总数为 661 个，全国城镇人口 57706 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 43.9%，城市化水平比 2002 年提高 4.8 个百分点。报告还指出，2006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由 2002 年的 64292 亿元增加到 132272 亿元，增长 1.1 倍；占全国 GDP 的比重由 2002 年的 53.4%上升到 2006 年的 63.2%，提高了 9.8 个百分点。2006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10862 亿元，比 2002 年增长 1.1 倍，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 59.3%。(6) 从这份统计中可以看出，城市化已经变成国家语汇中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它一直向着更高的目标攀升。由经济战略驱动的城市化运动不仅使城市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性空间，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必须不断升级扩容，才能缓解其发展的压力，它不仅鲸吞郊区和农村的土地，更要通过城市更新来重获旧城的发展空间——前者引发农民的土地维权群体运动，后者则导致市民反对拆迁的个人抗争。

2007 年 3 月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是中国城市更新运动中不计其数的对抗事件之一。由于它发生在《物权法》刚刚颁发不久，又运用了具有强烈视觉感染力的“孤岛”图片，并且结合了网络媒体快速传播的特点，于是迅即造成长久以来不满暴力拆迁的社会民意的井喷，吸引了大量中外媒体的关注，从最初与发展商及政府的极端对抗到谈判、和解并获得合理产权补偿，最后成了一个被称为“庶民的胜利”的标志性事件，事主吴苹、杨武夫妇被视为通过合法个人抗争去保护私有财产的英雄人物，他们成为中国广大城市拆迁户开展维权运动时仿效的楷模，而重庆地方政府对事件的周全处理也为人所津津乐道。(7) 在全民热议的盛大气场中，在网络世界的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的围攻之下，关于“拆迁事件不可见报”的行政命令自动解除，或者说



民意冲破了中国政府和传统媒体的底线，使重庆事件之后其它城市仍然陆续发生的众多拆迁事件得见天日，被人们公开言说。不论是官方的智库还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重庆事件余波散去之后仍在努力消化它所带来的冲击，试图寻找出它在城市规划、法制建设、个人权利、媒体生态、传播策略等等方面的意义，并准备把它写入历史——这看起来象是一个皆大欢喜、双方共赢的结局。

但“孤岛”的形象在我脑中始终挥之不去，因为它如此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城市社区的涣散不群、家庭的无所依傍、个人的孤立无援和政治通道的堵塞隔绝。试想如果吴苹、杨武夫妇所在的鹤兴路片区是一个居民交往活跃、彼此紧密联络、相互关怀扶持、团结对外的利益共同体；如果有一个社区协会或 NGO 能成为他们的代理并居中调停协商；如果媒体更早介入、为居民的意见表达打开更多通道和开放更多对话空间——“孤岛”图像也许不会在这个地块上出现，吴苹、杨武夫妇也不至于最后被迫成为孤胆英雄，当地政府也不用手忙脚乱地临时应对这场震惊世界的、足以动摇国家行政和司法权威的信任危机。

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对社区的摧毁不仅在于把多年形成的传统邻里关系离散到城市的各个缺乏配套设施的安置区，更在于它在拆迁过程中对人与人之间正常精神纽带和家庭伦理的切断与瓦解。发展商和拆迁公司都是百炼成钢的谈判和心理专家，他们有非常专业的策略来对拆迁户进行消息封锁，然后以先易后难的顺序把他们逐个击破，甚至使用离间的手段，在同一个家庭中挑拨夫妻、兄弟之间的利益争夺，从而攻陷他们的心理防线，实现最低拆迁成本的控制。在市场经济兴起和个人主义盛行多年之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和家庭凝聚力本已非常脆弱，再经历这种带有巨大心理压力的拆迁纷扰，更形近散沙。街道办事处作为中国城市社会最底层、最末梢的组织，多数都被拆迁户们认为站到了他们利益的对立面，其信用和功能均已失效，再难发挥街道润滑剂的作用。最紧要的是，人们生活在一个无信仰的时代，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导师可以成为他们的心理支撑，也没有权威的意见领袖可以成为他们的智慧依傍，为他们指点生活的迷津，帮助他们理解日益复杂和凶险的社会，他们如果在精神和思想上无法独立，在面对各种攻击和伤害时就更加无力反抗。

同时，中国的土地制度规定了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这使得农民在遭遇自己的土地利益被侵害时还能纠结成群；但在城市，土地是国有的，人们只能各自为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抗争。城市更新中的群体性维权行为并不多见，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还是非常敏感的，市民对此非常自觉，他们不愿因此被定义成一种有组织地针对国家制度和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因为背负着这样的心理阴

影，即使不同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境遇相同，利益诉求也一致，他们还是不敢结成集体，这使他们在面对强大的发展商和拆迁公司时显得势单力薄，非常被动。再加上，政府目前对很多 NGO 仍抱不信任的态度，民间志愿力量无法介入市民的维权行动，这使得很多冲突和对抗的处理缺失了第三方（无利益立场）的调停和协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民间志愿者资源的浪费，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市民的无助感。在这种情形下，只是成就了一个"史上最牛钉子户"而已，我们怎敢轻言"庶民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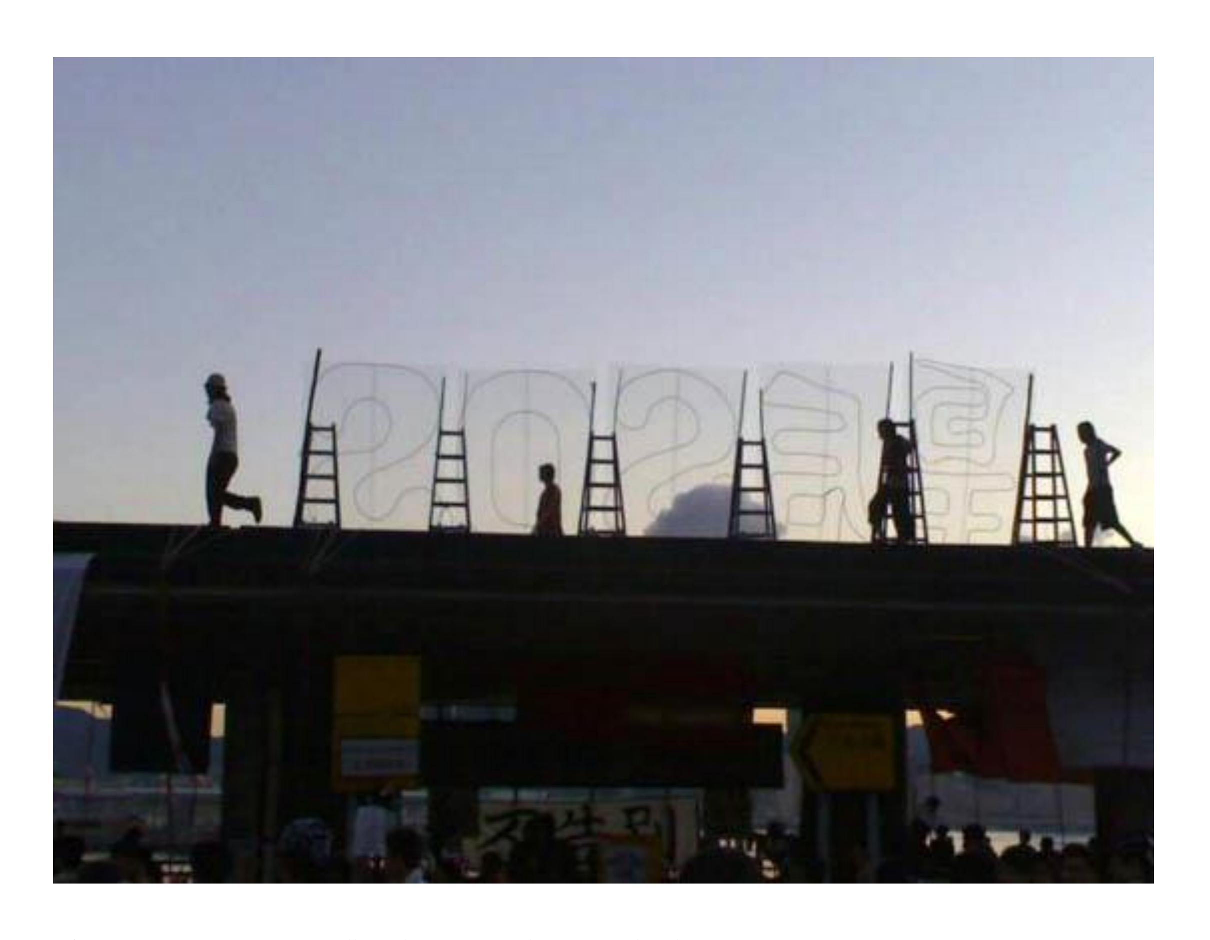
自 2003 年 SARS 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对社会危机的预警、管治和问责能力一直饱受批评。城市更新过程中因拆迁问题而积聚的矛盾已使社会如履薄冰，但政府在立法、管治和疏导方面一直迟迟未有解决方案。中国的官僚系统一直喜欢报喜不报忧，碰到问题时先把它掩盖起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喜欢公开化，谁都不想承担责任，向上传达的信息总是失实或片面的，这样问题越积越大，到最后总爆发时才不惜一切手段浇灭它，但往往为时已晚。当然，中国市民的素质也有待提高，有一些市民临时增加房产投入成本，把拆迁当成与政府和发展商展开博弈从而索取额外补偿的机会，这种机会主义无疑也增加了彼此之间的对立。有的市民因为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肃整，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不敢噤声，但等到别人冒着各种压力争取到更好的结果时又站出来要求分享，这种被动、自私和不劳而获的心理反映了他们灵魂的扭曲。政府在主导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要尊重生活在那里的市民的意愿和利益，同时也要对市民进行公民教育，应开放更多民意通道，允许团体合法化，邀请他们参与讨论和磋商，让各种程序公开化， 让公共利益、发展商的利益和市民利益在法律的框架内达成合理的分配。一个有生命力的城市应提供给公民社会生长的沃土，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城市的公共事务，树立市民的主人翁精神，从而实现市民自治。在这方面，中国城市仍然长路漫漫。

**在抗拆的街头**

2006 年 11 月，香港政府为了实施中区第三期填海工程和修建快速道，决定清拆有近 50 多年历史的天星码头及爱丁堡广场的钟楼，引发众多香港市民前往示威抗议。几位年轻人多次闯入了码头工地，甚至登上了隆隆推进的推土机，但仍然无法阻止码头和钟楼在 12 月 16 日被彻底拆除的命运。在对抗行动失败后，他们马上又转战近邻也要被拆的皇后码头，从自发、松散的状态改为成立"本土行动"的组织，开始长期占据皇后码头，在那里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到后期还进行了静坐与绝食。他们得到香港建筑师协会等各种团体的声援，运动从最初"保存历史建筑和集体记忆"的简单诉



求发展到对香港身份去殖民化、建立香港本土主体性、参与城市公共空间决策和城市规划民主化的论述和要求，在媒体上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得到了香港不同阶层的响应和支持，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这场持续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直到 2007 年 8 月 2 日香港政府出动数百名警员、消防人员、医护人员还有工程人员进行清场和强拆才告一段落。虽然皇后码头最后也未能幸免于难，但这一运动唤醒了香港社会的历史保护意识，点燃了人们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热情。



(皇后 SOS。图片出自香港电台－RTHK 中文新闻频道)

与中国内地城市爆发的以维护私产为主要目标的个人抗争不同，“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是一场由香港新生代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运动。这里所谓知识分子并非指他们是处于香港社会上游的既得利益者（即所谓的精英阶层），而是指他们长于思想和论述，在整个运动中一直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的自觉。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学生、网志编辑、独立记者和自由职业者(8)，在发起这一运动时不带任何个人利益色彩，在表达这个运动的诉求和目标时一直锁定在庶民的视点上，而把运动的对立面列为利益至上的财团、罔顾民生的权贵和带有殖民后遗症的政府。他们是香港回

归十年中涌现出来的"八零后"知识分子的代表，与战后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完全不同，后者在六十年代负笈海外，七十年代曾投入香港社会抗争，后来不是被殖民行政体系吸纳成为犬儒式的社会精英，就是在商本位文化中成为经济动物。"八零后"以 97 回归作为自己思想成长的分水岭，拒绝战后婴儿一代的精英倾向和殖民印记，俯身到香港的庶民历史中去找寻香港身份的认同和建立香港本土的主体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珍视天星/皇后码头的原因——这两个码头所在的中环滨海区自六十年代以来就是庶民抗争、集会和分享的城市公共空间，凝聚着香港民众的历史记忆。

可是知识分子也有其局限。虽然他们自许为庶民代言，但一向重视实利的普通香港人也许更容易理解钉子户的拼死力争，而无法明白这些年轻人以一场社会运动来运作他们宏大的历史论述和身份理论的野心。说老实话，阅读他们那些意旨深远又饱含才情的发言和写作(9)，目睹他们在整个运动中的策略和技巧，你确实会被他们开阔的思想视野和过人的行动力所征服，尽管没有实现保存码头的目标，他们却把整个运动推向了他们预期的历史高度。可是，在多数城市更新过程中，历史保护的理由并未强大到足以叫停推土机，它常常变成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以北京为例，普通老百姓一般都把历史当成他们的包袱（也许中国历史太悠久，根太深了，不像香港，一直是个殖民地，身份一直处于悬空状态，无根的感觉特别强，因此对历史特别饥渴），谁都不愿意住在破旧、拥挤、火灾隐患严重、要排队使用公共厕所的胡同里，人人都争住现代公寓，对他们来说，推土机意味着新的生活。只有知识分子站在外面忧心如焚，希望老胡同一砖一瓦都能保存下来。这时候政府和发展商可以挟持民意，把他们讥为物理保护主义，无视城市发展和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在这方面，香港的道理也是一样的。香港民政事务局长何志平就说过，"香港地价贵，要保留一处地方，应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10) 而天星/皇后码头的"集体记忆"，显然是不够有力的。

可见，从知识分子的先进理念到一般普罗大众包括发展商和官员的认知之间，天然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是观念上的，也是语言上的。有人说"本土行动"的年轻人水平太高了，他们的思想太深奥，一般人无法理解。因此，在天星一役失败后诞生的"本土行动"，调整了自己的战略，除了以"去殖民化"和"本土主体性"去继续深化"集体记忆"之外，又发展出"城市公共空间参与权"和"城市规划民主化"的新诉求。他们抨击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在制订中区规划时，完全为大银行、大财团、大公司等"有钱人"着想，根本不考虑草根阶层的利益，把本属所有市民共享的城市公共空间拱手让作商业发展，并且刻意隐瞒了驻港解放军要在此兴建一个军舰码头的事实，侵害了市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参与权和对城市规划的知情权(11)。显然，这些观点比起"集体记忆"



来更能激发普通人的共鸣，它从高端的知识分子历史论述向下转向他们的贴身权益，拉近了运动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同时又把运动从文化的层面提高到了政治的层面。为了克服表达上的曲高和寡，他们又专门出版了一本《本土行动皇后码头特刊》(12)，以最浅白的语言，以问答的形式，配上建筑师绘制的最简单的规划示意图，向香港市民传播他们的运动理念和替代性规划提案。

总之，“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所要维护的并不是可计算的物质利益，可以说它是一场针对城市更新和城市规划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对抗的是公共权力在分配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时的不平等以及分配程序的不合理，批判的是城市规划为了商业发展不惜牺牲历史遗迹、只重视物质利益而忽略非物质需求（城市的历史记忆和市民的精神认同）的唯经济论倾向，要求的是分享城市公共空间和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它冲破了香港这个有着深重的重商传统、行政体系去政治化并对反对力量有着巨大的吸纳能力的社会的限制(13)，传播了城市不仅作为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多样生活文化和多元精神需要的鲜活生命体的概念。就这点而言，这个运动实现了一次观念的革命，取得了非同小可的成功。

**迎向推土机**

在大中华地区，城市更新中的对抗运动在各个城市都有发生。过去三十多年来是亚洲地区经济大规模腾飞的时代，香港、台湾比中国内地领先一步，挤身于亚洲经济四小龙之列，其经济的扩张、产业的调整和人口的膨胀不断要求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新洗牌，在这过程中发生对抗在所难免。台北是一个在民主政治方面比香港更活跃的城市，因此早在 1997 年，这里就诞生了“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它是台湾第一个针对城市更新的社会运动，不仅知识分子和市民涉身其中，连不同的政党力量也被挟裹进来。因为它的焦点是对一个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贫民窟的清拆，涉及到这一社区居民的实际生存利益，所以它为城市更新及其对抗运动双方面的实践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语境。对于发起并参与其中的那些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相当是美国联邦政府自 1949 年至 1972 年间推行的饱受知识界争议的城市更新运动（包括简·雅各布布斯对它的尖锐批判）(14)在台湾的一个重演的版本。它的样本意义，当然还有这些知识分子自身对于社会道义和公民城市的理想信仰都驱使他们全身投入其中。因此它不是一个市民自发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并始终在政治的层面进行交涉和运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的、有着成熟的行动语法和风格的社会运动。



运动的引爆点位于台北市现第十四、十五号公园所在的地块，亦即中山区林森北路与南京东路的交界，日据时期这里是日本公墓，1949 年国民党战败，从山东和江苏等地撤退的士兵及其家属经由海南岛来到台北，在无住所分配和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自愿自谋生计，便在此搭起简陋棚寨聚居，后来慢慢吸纳从台湾其它地区来的移民而发展成一个社区，称康乐里。1956 年，台北市按日据时期的城市规划把这里编为公园用地，但多年来因为住户争议及预算方案的多次反复，公园计划一直未能实施。1994 年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曾深入康乐里，发动居民参与讨论，提出了“就地整建、社区重建”的设计方案并获得了台北第一届“市民参与都市设计奖”。1995 年陈水扁就任台北市长后继续维持公园计划，但承诺先建后拆，妥善处理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后在 1997 年 1 月又推翻这一原则，决定在 3 月 4 日执行清拆。在康乐里居民到市议会抗议无效之后，台大城乡所联同超过 100 多个知识界知名人士及民间机构在 2 月 1 日签名发起“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15)




(《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封面。图片出自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网站)

康乐里在被拆前的建筑均为低矮的自建房，以砖木结构加塑料板为主，居住着约

三千多人，一千多户，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户为老兵（台湾称为“荣民”）、残障者、临时工、 低收入户和贫困家庭。在运动发起者的眼中，康乐里是“一个包含了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彼此生活紧密连结的邻里”，也是“台北市最后一个如此独特少见的邻里”，人们在这里经年累月朝夕相处，虽环境欠佳，但彼此照应、相濡以沫；虽穷困窘迫，但在 1979 年台湾与美国断交后所发起的“捐机报国”运动中，却是台北捐款最多的里(16)。而在陈水扁的眼里，康乐里却等同地狱：“以台北的富庶，这里可说是都市之瘤、市民之耻，几千人睡在坟墓上， 令人无法想象，而一旁却是国际级的晶华饭店，每想起国际巨星麦可杰克森住在晶华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17) 这种把康乐里指认为贫民窟、认为它有碍城市观瞻的长官论调，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拆迁借口，与之相随的必然是把康乐里的弱势人群视同废物的潜意识——他的同僚在与运动人士的谈判和对峙中，就曾口气强硬地指出，“老人不搬也会死”。(18)

这些被认为无用的人群，正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著作《废弃的生命》中所说的“人类废品”(Human Waste)：“人类废品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构建(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和经济进步（这种进步必须要贬低一些曾经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会剥夺倚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谋生手段）必然的副作用。”(19) 在对现代化的狂热追求中，大量职业会变得过时，大量人口会成为弃儿。现代执政者之所以憎恨贫民窟，就是因为它聚集了太多的“人类废品”——他们非但不能增加政府的税收，反而加大了福利支出的成本。在政府眼中，贫民窟占据着城市尺土寸金的中心地段，它的地上建筑物却老旧残破，容积率低，毫无产出。除了偶尔可以充当一下“脏乱差”和“犯罪多发地”的靶子，被警察时不时去突击扫荡一下，以安抚纳税人的安全焦虑并增加他们对政府的心理依赖外，贫民窟还能做出何种贡献？接下来的思路也就顺理成章了：花较低的成本赶走那些“人类废品”，清空它的土地，直接卖给发展商的话可增加财政收入；或把它改为公园绿地，则可博得绿化和美化城市的美名，同时亦可刺激周边地产增殖。

在康乐里的案例中，社区破败跟不上时代步伐，需要更新无可非议；公园绿地是个由来已久并已通过的规划，而且是个公共空间，不执行不足以维护行政权威，也在法理之中；“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要反对的并非这些，而是陈水扁的台北市政府对弱势人群生命价值的漠视以及对他们在城市里的生存权的残酷剥夺。以这种思路执行的拆迁是一种暴政，正如运动的发起者夏铸九所说，“公园苛政猛于虎”！(20) 在公园的设



计方案还非常初级、并没有具体细节定案之际，在未解决好居民的赔偿和安置好他们的新居所之前，在短短数月内强制他们搬迁，以推土机摧毁他们多年来休养生息的家园，让他们流离失所，不顾他们曾为台湾做出的奉献，不顾他们的历史记忆，这就是陈水扁的“铁腕”本色。就算加入了政党竞选利益的博弈作为筹码，就算有当时的中央政务委员马英九、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立委张俊宏、林瑞图以及多位国民党议员和新党国代到现场声援，也无法挽救康乐里在 1997 年 3 月 4 日被夷为平地的命运。“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提出来的缓拆要求失败了。在拆迁当天突发的大火中，人们只听到抗议歌曲的回荡：“斩断记忆的桥梁，台北是谁的家乡？财团的太阳，穷人的坟场！”(21)

**遗忘与纪念**

其实，美国在战后二十多年来所推行的城市更新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以推土机暴政清拆贫民窟并不能根治城市的贫困。在被连根拔起后，贫民窟的人们会在城市的其它空间重新聚合，形成新的贫民窟；而不断的清拆和驱逐会进一步拉大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距离，加剧他们的对抗，以致酿成不可收拾的社会冲突。在六十年代中后期，美国在更新运动中的歧视政策引发了包括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底待律在内的各大城市的大规模社会暴动和骚乱，每次死亡人数 30-40 人，受伤过百成千，街区破坏惨重，损失以数千万美元计。(22) 这是导致美国中止其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在亚洲城市，仇恨贫民窟、要除之而后快的思想仍然大有市场。不仅十年前台北的康乐里遭此歧视，今天从北京的古老商业街区大栅栏到伊斯坦布尔的千年罗马社区苏鲁可勒(Sulukule)均难逃厄运。在台北“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中，发生了老兵自杀的事件；而在北京和伊斯坦布尔，各类抗拆事件也不绝于耳。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眼前利益的遮蔽下，无视历史的教训，不断犯错。遗忘，是人类的一大病。





(Gordon Matta-Clark, Splitting, 1974)

在美国城市更新运动的晚期也就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艺术家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在城市内开始了他的"破坏"活动。这时候美国各个城市内部都存在着大量被弃置的房屋，它们的土地和产权已被征收，但因政府、发展商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争议，预算迟迟不能到位，更新工程无法展开，其衰败日甚一日。马塔－克拉克开始肢解这些房屋，或卸下一面墙，或切割它的门窗，或挖出一个几何造型，不仅以此来展示建筑内部的颓败，更提醒人们私有财产和社会结构的脆弱不保。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是 1974 年在新泽西州东北部一个城市恩格伍德(Englewood)实施的《分裂》(Splitting)：把一幢二层空屋从中切开，一分为二。这与其说是艺术家对建筑的"破坏"，不如说是他为那些在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中被无端掠夺的不动产产权发明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纪念方式 。房屋上这条豁然剥开的裂痕，是追悼，更是美国城市阶层分化和社会对立的象征，它引人思考城市的建与拆的问题。马塔－克拉克英年早逝(1943-1978)，他的多数"城市破坏"行为，都以图片、录像、文字、草图的形式保存下来，与他从各处切割下来的建筑碎片一起，被美国和欧洲的美术馆和画廊收藏，作为传之后世的艺术作品，去对抗人们的遗忘。(23)



Rachel Whiteread, *House*,1993-1994, London. Photographs by John Davies

在英国，由于二战对城市的破坏，更新运动在战后也大规模展开。与美国不同的是，主张市民参与和庇护邻里的“社区建筑”(Community Architecture)运动自六十年代以来在英国获得较为健康的发展，专业建筑师的自觉、民间组织的介入和政府政策的调整取得较好的协调，八十年代后获得查尔斯王子的高调支持（他成立的王子基金会专门关注城市和社区环境的建设），九十年代后又发展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主张混合功能、减少能耗、把社区保育和城市更新进行有机结合的“紧缩城市”(Compact City)理论，可以说各个阶层市民的利益一直得到尊重。1993 年，艺术家拉切尔·惠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应约为伦敦东区 Grove 路与 Roman 路交界处的一幢待拆的维多利亚式联排住宅创作一件作品，她向这个三层高的楼房内部灌入水泥混凝土，待其凝固后再把所有外墙拆去，建筑的内部负形空间于是显现出来，并变为无法穿透的实体。艺术家将此称为她的雕塑，并命名为《家》(House)。位处伦敦东区这个渗透着种族隔离和移民纷争历史记忆的特殊街区，这个作品被路人喷上的第一个涂鸦句子是“为了所有白人和黑人的家”。(24) 没有人被遗忘，也没有人遗忘历史。这个沉默笨重、体量巨大的公共艺术作品就像一座超越了族群差异的平民生活的纪念碑，它激发了人们对单纯的人的价值的想象。

作为已经发展成熟甚至呈饱和状态的经济体，美国和欧洲的城市现在不是停滞不



前就是开始收缩，它们所遭遇的地区问题，总是希望放在全球化的平台上去解决；而作为新兴的经济力量，亚洲和其它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仍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在扩张，它们则负责提供全球化问题的地区解决之道。这恰好符合蒙特·鲍曼提出的“地区性问题全球解决/全球性问题地区解决”的现代性模型假设(25)。要接纳庞大的国际资本，要运作复杂的经济系统，要调动巨量的人口，亚洲城市正在奔突腾跃，找寻空间，迎接挑战。建还是拆？戈登·马塔－克拉克在他的作品中提出的这个不仅充满思辩色彩同时又具现实急迫性的问题，现在也摆在亚洲各城市执政者的面前。正如丹·格拉海姆(Dan Graham)所说，这个问题一直未被回答或解决(26)。它考验着人们的道德和智慧。本文考察了大中华地区三个不同城市在更新过程中所出现的对抗事件，这些事件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对立双方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得失，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把人遗忘，是否认为所有人的生活都值得呵护和纪念。而城市的生与死，亦与此紧密相关。

注：

(1) 简·雅各布布斯(Jane Jacobs)，《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y)，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

(2) 矶崎新(Arata Isozaki)，《未建成/反建筑史》(Unbuilt)，胡倩、王昀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3) 马清运、梁井宇短信对话，《当代艺术与投资》，2008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4) 《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沙龙恳谈会记录》，搜房网， http://news.sz.soufun.com/2008-02-01/1495211.html

(5) 同(3)。

(6) 《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人口已达 5.77 亿》，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cj/hgjj/news/2007/09-27/1036849.shtml

(7) 关于吴苹、杨武事件的详细过程请参考《南方周末》张悦的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内幕调查》(2007 年 3 月 29 日)及《重庆这几天发生了什么》(2007 年 4 月 5 日)。

(8) 参见梁文道对陈景辉、周思中、朱凯迪和邓小桦的采访《七、八点的太阳》，《明报》，2007 年 8 月 5 日。

(9) 比如周思中的《在解殖的街头》，《今天》文学杂志香港十年专辑，2007 年第二期，夏季号；陈景辉的《谁的香港故事，什么样的香港人》，《明报》，2007 年 7 年 29 日。

(10) 见《南方都市报》龙志的报道《中环天星码头拆迁事件唤醒港人“本土行动”》(2007 年 6 月 9 日)。

(11) 对军舰码头的说法我有保留，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会立法保护其军事机密，规定其解密年限，军舰码头的兴建应属军事机密，不可随便对外公开。

(12) 朱凯迪、周思中编辑，本土行动出版，2007

(13) 社会学家金耀基把港英时期香港的政治体制称为“行政吸纳政治”，即把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通过



开放行政管治体制的方式吸纳掉。见强世功《"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读书》，2007年第9期，总第342期。

(14) 自美国国会1949年颁布住房法起的二十多年内，美国联邦政府在1100座城市推动了2800项更新工程，所涉联邦拨款达100亿美元，工程用地达20万英亩，其中8万英亩为贫民窟改造工程，后因饱受非议，美国国会于1972年通过尼克松政府的"岁入分享"议案，决定终止这场城市更新运动，而事实上直到1980年里根上台这一运动才真正得以结束。见李艳玲《美国城市更新运动与内城改造》，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第152-154页、第162页。

(15) 参见《反对市府推土机大事记》，《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黄孙权主编，反对市府推土机联盟出版，1997。

(16) 参见《关于十四、十五号公园上的社区康乐里》，出处同(15)。

(17) 《联合报》，1996年11月12日。

(18) 同(15)。

(19)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废弃的生命》(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6页。

(20) 《中国时报》,1997年1月22日。

(21) 《穷人的坟场》，改编自陈水扁台北市长竞选歌曲《台北新故乡》，黄孙权、彭扬凯作词，出处同(15)。

(22) 李艳玲《美国城市更新运动与内城改造》，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第150-151页。

(23) 关于马塔－克拉克的作品及生平，请参考 Gordon Matta-Clark, edited by Corinne Diserens, Phaidon,2003.

(24) 参见 Doreen Massey 关于《家》的文章《时空和场所政治》(Space-time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胡宇之译，《艺术当代》，2004年第3卷第4期。

(25) 同(19)。

(26) "To construct…or to deconstruct? This question, which Matta-Clark's work raised, is still unanswered, unresolved." Dan Graham, Gordon Matta-Clark, Shrinking Cities, Vol 2, Hatje Cantz, 2006，Page 96.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丹尼尔·李布斯金：《破土：生活与建筑的冒险》**






作者: [美] 丹尼尔·李布斯金

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生活与建筑的冒险

原作名: Breaking the ground

译者: 吴家恒

出版年: 2008-1

定价: 46.00 元

ISBN: 9787302159230

**荐书：简·雅各布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作者: [加] 简·雅各布布斯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金衡山

出版年: 2005-5

定价: 29.50 元

ISBN: 9787806578575

# 【工作空间】

大汗还有别的地图，绘制的是尚未被人发现而只在想象中见过的、幸福的土地：新亚特兰大、乌托邦、太阳城、大洋城、塔莫埃、新和谐、新拉那克、伊卡里亚。

忽必烈对马可说：“你到过那么多的地方，见过那么多的标记，一定可以告诉我，和风会把我们吹向哪一片乐土。”

“关于这些港口，我不能够在地图上画出路线，也不能够预言着陆日期。有时，我只要瞥一眼，只要不协调的风景出现一个开口，只要浓雾里发出一下闪光，只要听到人群中两人相遇时的对话，那末，从那里出发，我相信可以点点滴滴拼砌成一个完美的城市，它的建造材料是一些混杂的片断、间歇的瞬息、不特别为了让什么人接收而发出的讯号。如果我告诉你，我要走的行程在空间和时间中都是不连续的，有时松散有时稠密，你可不能相信从此就应该停止追寻这个城。在我们此刻谈话的时候，也许它正在散乱地在你的帝国版图之内升起；你不妨追寻它，但必须依照我所讲的方式。”

大汗已经在翻看另一些绘着在噩梦和咒诅中吓人的城市的地图：艾诺克、巴比伦、耶胡兰、布图亚、勇敢的新世界。

他说：“如果我们最后只能在地狱城上岸，那末，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而它正好就在那里，也就是海潮牵扯我们卷进去的、不断收缩的旋涡。”

可是，波罗说：“活人的地狱不一定会出现；要是真有的话，它就是我们如今每日在其中生活的地狱，它是由于我们结集在一起而形成的。我们有两种避免受苦的办法，对于许多人，第一种比较容易，接受地狱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样就不必看见它。第二种有些风险，而且必须时刻警惕提防：在地狱里找出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习认识他们，让它们持续下去，给他们空间。”

——摘自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 10-3 译言网：快乐的住办公室一族

“在俄罗斯，住在办公室成了很多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并形成了这样一种企业文化和氛围。住办公室一族既是为工作所需，同时也是因为很多公司拥有比家还舒适的生活条件。”

文章来自译言网，译者笑溪，原文来自 newizv.ru

在俄罗斯，住在办公室成了很多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并形成了这样一种企业文化和氛围。住办公室一族既是为工作所需，同时也是因为很多公司拥有比家还舒适的生活条件。



俄罗斯媒体对本国 1757 名劳动者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40%的人工作合乎劳动法规定的时长，9%的人工作时间更少，而 35%的人工作时间为 9-12 小时，11%的人超过 12 小时，5%的人甚至一周 7 天都得工作到筋疲力尽。其中，IT 工作者、银行家、设计师、高级经理人、广告代理商、律师、医生和老师们是其中的代表。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没来得及透过窗户落到办公桌时，他们就早已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忙碌生活，直到凌晨回家歇息片刻，随后又回到办公室进行着新的工作。

莫斯科银行的职员伊琳娜•波里索娃常常工作到凌晨两点才能回家。“我以前的女上司让我们养成了每天工作超过 11 小时的习惯。工作是她生活中最主要的乐趣。虽然现在换了新的上司，但是我们仍按照以前的作息制度来工作。”她强调道，“我的工作



还算有意思，处理面临的各种问题都能让我体味到些许乐趣。这样想来，我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正是这紧张的工作方式使得住在办公室有了现实必要。叶琳娜·阿列菲娃是某公司的项目经理，每年的五、六月份和年末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候。有一次在新年前夕，为了给另一大型公司准备礼物，叶琳娜一连忙了几天。由于人手不够，叶琳娜亲自出马：去供货商那里取来礼物，然后进行精细包装，再按照地区发送至客户手里。办公室俨然成了她临时的家，几天的时间里，叶琳娜都住在办公室里。不过她似乎并不因为这种生活而产生心灵上的疲倦，她说："我喜欢这样忙碌的生活，它让我有种满足感。"

社会学家娜塔莉娅·华尔斯卡娅认为，工作狂们其实并不是在生活，他们只是在为生活做着准备。专家也一再强调：长时间的工作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不容小觑。尽管如此，执着的工作狂们仍喜欢赖在办公室里。除了享受那种充实的自我满足感之外，他们或许还在等待着加薪升职的好机会。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住在办公室是因为办公室比家更舒适、更方便。



走进俄罗斯重要的网络服务门户，也是欧洲第二大流行搜索引擎——Yandex 在莫斯科的办公室，相信你立刻就能产生一种心旷神怡的美妙感觉。这是一个集高科技、温馨舒适、友爱氛围于一体的工作空间，被誉为"最美丽的家"，24 小时为员工开放。整体轻快的暖色调，随处可见的绿植给办公室增添了几分亲切与自然；透明的玻璃内墙，各式布局的工作台让工作变得小有情趣。而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着优质的空调和通风设备，各类娱乐、健身、餐饮等生活设施更是十分地齐全。办公室时光因此也变得多姿多彩起来。累了，这里有柔软的沙发供你歇息小憩；饿了，这里有免费的午餐要你一饱口福；倦了，这里有丰富的酒饮等你轻斟浅酌；困了，这里有童趣的吊床让你安然入梦。如果你热爱运动、钟情艺术，在工作之余也能找到去处放松身心。

俄罗斯另一互联网公司 MAIL.RU 的办公室同样也为员工提供各种舒适的生活设施——吊床、沙发、化妆台、按摩椅、淋浴室、健身房、活动室等等。据那里的一名员

工称，他住在办公室，并遵循规律的作息制度。2010 年夏天的那场森林大火之后，住在办公室的人数尤其多。办公室良好的室内条件减少人们因大火烟雾所引起的不适。此外，那些面临房子换租的员工们也可以把办公室当作自己临时的家。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 10-4 黄英琦：以共享精神重新定义工作空间


黄英琦：香港 Good Lab 共享工作空间创办人及召集人。

> 在网上有一则邀请世界各地共享空间联署的“共享工作空间宣言”（co-working manifesto），道出了共享空间的存在，是为了建立“信任小区”：“我们奉行以下价值：合作而非竞争、社群意见比个人议程重要、参与比围观重要、做比说重要、友情比形式重要、敢于尝试而非追求安稳、不断学习、永远把人放在第一位、关注生态系统而不是价值链”。

引言：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推动该市成为“共享城市”(sharing city)。什么可以共享？停车位、孩子的衣服、各种工具、小区空间等，都可以在不同时段拿出来。只要大家在小区建立共享文化，资源运用便会更为有效，社会可以更美好。

**共享 VS 私利**

我在九月底与三十位参加“MaD 创不同旅程”的香港年青人考察首尔的社会创新。选择首尔，是因为自称“社会设计师”的朴元淳市长在去年底当选后，以社会创新和共享精神作为施政理念。他率先开放政府的办公楼及会议厅，让市民在晚上使用；他也成立了“七人委员会”，由市民自荐出任，每隔数周与市长会面，批评他的政策，而他则会谦虚聆听，把意见写在不同颜色的 post-it 贴纸，贴在办公室墙上。

他更推动首尔成为“共享城市”(sharing city)。

“共享精神”由开源(open source)软件运动带动，是社会创新和范式转向的大趋势。

共享或分享并不是什么高深和崭新的概念，是“有福同享”的人类交往文化而已，例如妇女之间互相交换食谱，就是“共享”。这种对资源和创意的开放态度随着商业社会把发明和产权专利化及以法律垄断使用权之后逐步变质。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群硅谷的软件工程师由 Linux 牵头，响应大公司对软件价格的垄断，鼓励开源。

开源运动发展十多年，能量越来越大，网上的免费计算机系统、软件和 app 都很多；在版权领域有“创意小区”(creative commons)，版权持有人愿意与人共享创作，不独揽版权。开源背后也是“流通”的价值，由美籍印裔青年沙文.可汗(Salman Khan)创立的免费网上补习社 Khan Academy 是“开源教育”(open source education) 的表表



者，连盖茨基金会也乐意拨款支持。在政府，共享精神是“开放管治”(open source governance)；在工作间，则是“共同办公空间”(co-working space)。

开源运动把“由谁拥有”的概念重新定义，让公与私的界线模糊化。它始于朋辈协作，理念务实；不过，在市场主导及利润最大化的心态下，要鼓励共享，就似乎要与“独家”和专利背道而驰。

**Good Lab: 共享工作空间**

根据美国 Deskmag 网，旧金山是“共享工作空间”的发源地，全球的共享工作空间在过去七年发展迅速，已有超过一千七百个。据 Deskwanted 网页统计，这些空间逾四分三在欧州、美国和澳洲，亚洲城市才刚热起来，估计在未来数年会遍地开花。现时新加坡有一个 Hub，开张三个月收了逾百会员，而上海早有“新单位”，是个创意工作小区。

在香港，我与谢家驹博士、张瑞霖及魏华星等刚在长沙湾启动二万平方呎的 Good Lab(好单位)。我们希望它是个促进合作，为社会创新提供资源，令创意变成行动的小区。在那里，没有狭窄的木板隔间房，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桌，会员每天想坐哪里也行，像家也像咖啡店。Good Lab 的目标，是让社会创业者与各行各业的志同道合朋友连结，建立互助和创新的网络。因此，空间除了有办公桌、免费上网和咖啡，也会长时间开放，并定期举办多样化的讲座和工作坊，让更多人明白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Good Lab 以社会企业模式运作，收入靠会员和活动收费，在启动时得到恒基及 RS Group 的赞助，期望能尽快达致自负盈亏。

我相信“共享工作空间”将会是个新的工作模式，它能有效响应创业的昂贵成本，也能协助社会创业项目的启动。在香港，大多数年轻人都在打工，甚少出来创业，其中很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创业成本高，单是租金一项就足以吓倒很多人。但时代在变化，有很多事情可直接通过互联网处理，早期的创业项目也不需要很大的办公室，社会创业则更需要跨界思维的启发，寻找拍档和资金的机会和各方面的专业意见，这些都可在一个共享平台找到。

**建设“信任小区”**

在网上有一则邀请世界各地共享空间联署的“共享工作空间宣言”(co-working manifesto)，道出了共享空间的存在，是为了建立“信任小区”：“我们奉行以下价值：合作而非竞争、社群意见比个人议程重要、参与比围观重要、做比说重要、友情比形



式重要、敢于尝试而非追求安稳、不断学习、永远把人放在第一位、关注生态系统而不是价值链”。

香港社会普遍缺乏信任，也缺乏跨界合作的方法，要建立“信任小区”似乎有点理想化。但这确是 Good Lab 的使命。在这个空间，规矩由会员共创（co-create），责任由大家分担，会员是来自十方各界的创革者（changemakers）—艺术家、学者、商界、设计师、IT 人、老师、环保工作者、创意人、社会企业家，他们要懂得“和而不同”，以“信任”作为核心价值，建立一个崇尚合作、重视参与、敢于创新的社群。若 Good Lab 及类似空间成功，将会带来思维改变和范式转向(paradigm shift)，香港有更多社会创业家，一起创造可持续、公平和具影响力的未来。

当下的香港面对着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等严峻挑战，只有通过共享、信任、创新和跨界思维，才能把挑战转化为机遇。

（本论文已全文发表过，此次是二次发表，原文首次发表在《装饰》杂志 2012 年第 11 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 10-5 张黎：现代办公空间的设计百年：效率、等级与身份

> 以效率为代表性诉求的现代性，以及以性别差异为典型的等级性，在当代以及未来办公空间的设计趋势里，将以“暧昧气质的公共空间”作为主要呈现形式。宏观层面上，它仍然言说的是男性气质明显的、社会空间的精英文化。以办公室作为文本，现代性在空间、家具、光环境、装饰等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显现出它独有的理性魅力；微观层面上，在办公空间的诸多设计实践里，各种无法规避的等级性被设计转化为柔性的、彰显多元主义价值的各种差异，职位的、行业的、种族的、性别的、年龄的……各种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不再那么肆无忌惮地呈现于视觉表面了。

张黎：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从1890年开始的百年岁月里，“办公室”一直都被西方文化视为“现代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原型场所”[1] ；也正如英国建筑设计师、著名国际设计咨询集团公司 DEGW 的创始人之一达菲所言，“办公室已成为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雇员最普遍的……体验之一。20 世纪晚期的主要景观就是办公室”[2]。19 世纪手工家庭作坊的专业化曾被视为工业化进程的标志性现象之一，但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办公室转向’——19 世纪末开始，大量雇员的工作场所从工厂集中迁移到办公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的文化与历史意涵甚至“被完全忽略了”[3]。本文将从设计史以及文化研究的角度，从方法论层面重点关注“效率性”在办公空间设计历史中的演变过程，以及从性别范畴的切入点讨论“等级性”对于不同性别身份的办公室雇员的差别化意义。

**一、现代办公室设计的历史流变：1890—1990**

现代办公室的内部空间规划、路线移动导向、办公家具与设备、光线与灯光布置、色彩策略、材料运用、装饰风格等都被统一于“科学管理”、“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等凸显“效率性”的泰勒主义原则。20 世纪办公室设计准则“效率至上”是泰勒主义的主要体现，正如英国学者沃德海森指出的，“泰勒主义对于以效率为导向的设计美学的影响力正如包豪斯对于现代主义设计的影响力一样深刻”[4]。19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泰



勒主义，最初被运用于工厂等以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模式的工作环境，其宗旨是实现科学化管理：将整体任务分解为若干单元环节并分配给每一个工人，并认为当单体效率最大化的时候即可预见整体效益的最大值。这种分工合作、化整为零的理性主义在工厂车间得到了有效地印证之后，“也被 20 世纪初期的办公空间设计所效仿”[5]。“从工作的例行程序来看，办公室职员与工厂工人更加相似了。”[6] 办公室内部被划分为负责各种具体工作的部门，同一部门的雇员处理同一环节的相似工作。除了工作环境不尽相同之外，在工作流程方面，两种群体都好似易被替换的标准零部件。从办公空间的规划来看，泰勒主义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内部空间的规划设计通常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效率为导向，以工作流程为依据，以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或空间移动为具体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办公室职员对工作与自我的控制权也被进一步削弱了。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的英美等国，求职市场不甚景气，很多办公室职员宁愿自降薪酬也要保住工作，雇主也因此无需在改善工作环境等方面增加任何投入，这十年也成为办公室设计史当中最平淡的年代。（图 1）当时的办公空间，不论在家具设备、空间规划、光线环境、室内装饰等各个方面，与工厂车间的工作环境并无本质差异，“工业化风格的办公设备、寡淡的装饰，……只能从职员所穿的服装上才能看出与工厂环境的差异”[7]。工厂化、工业化、机械化的办公空间特征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图 2）值得注意的是，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办公室设计出现了有意识的风格转型，“去工厂化”、树立不同于工厂车间风格的办公室设计意图十分急切。同时，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设计意识形态的逐渐式微，办公场所内部空间的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即时”的后现代

风格转向：多元价值与人性关怀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办公空间设计的认识论主导。然而，与私人空间以及其他公共空间迅速承载了后现代主义设计教义演变路径的不同，尽管办公空间的设计程序里补充了多维向度的价值考核，以及从“雇主为导向”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以“雇主——雇员为整体”的立场，“效率”、“效益”等直接与资本逻辑挂钩的核心价值仍然处于强势的中枢位置。在办公空间设计领域，与“技术”、“机械”、“工厂”、“车间”等概念撇清关系是当时企业雇主最迫切的意图之一，也成为设计师努力创造独特视觉特征的主要推动力；各种新兴的办公设备，诸如打印机、复印机、录音机、电话应答机、出票机等，从体量、结构、工艺、材料、色彩、造型等各个方面进行重新设计，目的只为尽可能地消弭办公设备的“工厂化气质”；尽管如此，以结构作为基本造型语汇的机器美学及其视觉特征还是相对突出，且跨越了相当长的历史周期。（图 3）





1.1933 年使用巴勒斯（Burroughs）计数器设备的簿记办公室场景。图片来源：明尼苏达大学查尔斯·巴贝奇研究所，巴勒斯公司系列收藏，编号 cb000186。



2.1934 年，美国公平永安保险公司的簿记工作人员正在使用穆恩·霍金斯（Moon Hopkins）品牌的速记设备办公。图片来源：美国历史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学会，茱莉及其儿子（P.A.Juley & Son）系列收藏品。


ADLER


我在中國
論壇
Co-China

3. 打印机设计的历史演变，由上至下依次为1880年代、1900年代、1920年代、1930年代、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的典型打印机产品。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办公空间设计的真正改变发生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这十年。如果说之前囿于技术限制以及意识滞后等时代局限，办公空间的设计始终无法摆脱与工厂车间的工作环境的视觉关联的话，进入60年代以来，以“模仿富有家庭的居住环境”[8]的思路更新，才真正确立了办公室与工厂工作环境相迥异的设计风格。当然，这一设计变革的成功，与当时就业时局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也不无关系；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从事文职工作，与工厂以增加薪酬为主要手段不同，办公室以休闲舒适的工作环境作为主要卖点。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国家，办公室职员与工厂工人的薪酬水平大致相当，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工作环境及其隐喻的身份认同。另外电脑办公自动化技术的逐渐普及，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办公空间实现“脱工厂化”目标的重要外部因素。在这些技术的铺陈下，办公空间变得紧凑、简洁、干净，更加现代化了。从女性职员的性别身份视角来看，这一改变也具有另外的社会学意义。已婚女性成为白领工人，到现代化的办公室工作，一方面办公室里的新型人际关系网络弥补了久居家庭、与社会公共空间之间的断裂感；另一方面模拟家庭环境的办公空间设计也为其延续了熟悉的安全感。在雇主的立场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有助于女性职员能更好地投入文职工作当中，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泰勒主义对于现代办公空间美学的持续干预，以至成为20世纪70至80年代崇尚自由、强调个体价值的英美文化中的“不和谐”因子。在企业利益为主导、雇主思维为本位的办公空间设计领域中，不论社会整体如何诉求去官僚化、去等级化，始终无法摆脱泰勒主义的辐射势力。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英国环境心理学家大卫·唐把20世纪80年代的办公室设计称为“企业效益的十年”：高速电梯、规则化空间、电脑控制的灯光系统、中央空调”等技术霸占的工作场所，消除了个人的控制力，从而实现了统一管理的可能性。[9] 在这种被技术掌控的人造空间里，人与外界环境的完全隔离，季节、天气、时间、地理等变化不会对室内办公工作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但长此以往，对久居办公室的白领人群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却产生了较大的伤害。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集中出现大量“高楼综合症”[10] 患病人群，甚至导致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熟练办公技术型员工的用工短缺现象”[11]。至此，“效率至上”的设计价值受到了舆论与市场的双重质询，办公室设计方法论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再次出现明显的“柔性”转向。



从办公室设计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办公空间最有效的利用方式并非尽可能地提高公用办公空间的占有率，而是尽量合理化规划个体员工的人均办公面积，并扩大拓展公共空间的面积与功能——诸如咖啡室、瑜伽房、游戏厅、露天休息区等各种多用途的社交空间的设置——才能最大程度地缓解快节奏以及高压力的办公室工作对员工精神与心理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益及其对企业的忠诚度。事实表明，当雇员处于放松、舒适、宜人的工作环境时，才会主动地开发并高效利用其全部的工作效能。“这种思路很大程度上肃清了泰勒主义时期在办公空间设计领域遗留下的‘等级性’的符号意涵。”[12]即使如此，在标榜多元化、人性化、自由主义的21世纪办公空间设计领域，在视觉层面仍然呈现出统一的、理性的克制面孔，有节制的后现代主义成为21世纪以来办公空间设计的风格特点之一。可以说，在热闹的“反现代主义”的设计民主进程中，办公空间及其家具设备的设计独树一帜，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以方盒子等简洁几何造型为主的视觉语汇传统，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等中性稳重的商务色彩仍然是无法撼动的主流色系。正如梅尔森所言：“甚至直到今日，很多人在五步之外都很难辨别传真机、复印机和打印机之间的差异，这就是现代技术美学对于办公室（设计）的挟持。”[13]

**二、办公室（Office）的“知识考古”：现代性与性别区隔**

英语词汇“Office”作为名词，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里对应的中文意思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办公室、事务所”、“政府机关、其建筑物”、“职位、职务”、或“职责、任务”[14]；Office来自拉丁语Officium，在古罗马时期亦代表了多重含义，诸如“服务”、“责任感”与“礼仪”等。“办公室”在中文语境中的意思可从字面进行解读：“办理公务的房间”，引申开，对内部员工来说是工作的地方，对外部消费者而言则是提供服务的地方。

1. 办公室：现代性的浓缩物

如前文所述，自19世纪90年代起，“办公室”作为一种新兴公共社会空间类型出现伊始便被视作“现代性”的典型浓缩物。办公室及其工作类型集合了理性生产、高度流程化等现代性的主要特点。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一书中写道：

“我们的现代生活已经创造了……一流的办公家具。”[15] 密斯·凡·德罗于1958年设计的纽约西格兰姆大厦，一方面被视为国际主义设计风格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钢框架结构与玻璃幕墙等新技术的试水之作，同时也为之后20年的办公大楼设计奠定了基础、树立了经典，更被视为“现代性”标签的集大成所在。密斯·凡·德罗曾将办公室



比喻为“工作的机器”，显然是受到了柯布西耶在机器美学理念中将建筑比喻为“居住的机器”的灵感。不论如何，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办公室设计美学确实受到了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直接且深远的干预力。

西方现代办公空间的需求以及设计项目集中涌现于战后年代，即 20 世纪 50 年代初，基本上等同于现代主义设计思想成熟，并逐渐演化为国际化设计原则的初始时期。基于科学化、效益化等管理学理论的办公空间设计，其主要特点呈现出以简洁、开放、灵活为主要视觉风格、功能化、模块化的空间组合体成为现代办公空间设计的主要趋势。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办公室景观的开放空间设计原则不再新鲜，取而代之成为代表了低成本、高效率、现代化的办公室图像（Office Image）：所有雇员聚集在无隔断的开放空间同时工作，由此而呈现出竞争力的、活力的、市场化的热闹场景。然而，开放化的“办公室景观”（Office Landscape）[16] 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设计模式（图 4），荷兰学者迪·克鲁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开放布局的办公空间的设计益弊兼有：益处主要表现在一是强化了对工作量的认知，二是提高了工作期间的沟通效率。其弊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降低了雇员对于私密性功能需求的满足感，同时也相应影响了对工作的满意度；其次，这种开放式布局的办公室也并没有促进雇员之间的人际关系。[17]





4. 位于慕尼黑欧司朗办公室的平面图以及室内实景，典型的办公室景观（Bürolandschaft）布局， 由德国建筑师沃尔特·海恩（Walter Henn）设计，1963 年。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由此可见，开放式的办公室空间的设计趋势，其背后推动力仍然在于资本逻辑以及以雇主为主的价值导向。对于企业而言，开放式办公空间设计显然利大于弊；对于职员个体而言则当它论。完工于 1973 年荷兰中东部城市阿培尔顿的比尔希中心（Centraal Beheer）保险公司办公大楼是设计师赫曼·赫兹伯格（Hertzberger H）的代表作品之一。（图 5）该设计采用堆栈的方式，将每一个独立的办公空间作为一个模块，以线性但非规则的方式，按照个人化的需求进行排列分置，每一个“工作岛屿”单元中的六名员工可以按照各自的喜好来装饰其内部空间。这种人性化的方式仍然符合了以功能主义为主要原则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从外部宏观看来每一个模块尽管各自独立，但仍然从属于某种连贯的整体风格；从内部微观来看，模块为体现个人意志、自由表达权利提

供了操作空间。综合而言，比尔希中心很好地或解决或协调了企业与员工、整体与个体、公共与私人、稳定与变化、工作与社交、建筑与室内等矛盾关系，被称为办公空间设计史上的里程碑作品。



5. 比尔希中心办公空间的室内景观。图片来源：网络资料。

2. 办公空间的性别化与等级化

在办公室女性文职人员（Office Lady）这种新身份出现之前，绝大多数女性被囿于家庭生活，其身份认同主要途径来源于私人关系以及家庭生活。因此，办公室这种新型公共社会空间的出现，在宏观层面上，对设计史来说具有研究价值，对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大众启蒙具有重要意义；在微观层面上来说，也是得以窥视女性身份在自我认同以及社会实现等两个方面的生动文本。从设计史视角来看，大量存档历史图片资料也都描述出了女性与办公空间的亲密关系。（图 6）




6.1930 年代英国办公室图景，大部分基层文职人员为女性。图片来源：办公室博物馆（Office Muesum）在线档案。

在父权制社会，不论是宏观的城市规划，还是微观的建筑及其室内环境，办公空间的设计往往直接而显在地体现了男女两种社会群体的存在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18][19]。办公室作为两种社会性别群体的共存空间，它的布局、位置、区域划分等也体现出了或隐或显的性别化差异。美国地理学教授多姆斯（Domosh，1992）将城市意象作为父权制社会的典型隐喻："办公室以及办公室工作成为父权制经济的来源与站点；办公大楼的建筑造型可被视为勃起的男性生殖器；是一种被包装过的权力存在。"[20] 老式传统的办公大楼多采用严格的楼层区分，也因此被解读为"社会阶级制度"[21] 的结构表征与符号隐喻。人们首先在物理空间被严密地区隔开来，于是，在工作层面和精神交流层面的沟通、共享、移动、灵活、变通等新型办公工作的特点只是新兴办公室空间设计的伴生物。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琳达·麦克道尔以伦敦市中央商业区的办公空间为例子，论证了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互为同构异形物的论点。一方面，办公大楼的空间设计规制了员工的工作模式与人际关系准则；另一方面员工在办公空间的日常工作也成为"其定义、围合以及控制的公共与私人空间的关系产物"[22]。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于 1906 年设计的位于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拉金行政办公楼（图 7）"第一次将办公楼建筑设计与管理学哲学结合起来"[23]。在拉金行政办公大楼里工作的大部分职员都是女性，为了迎合女性职员的心理需求，赖特特意采取了女性化的设计风格：简洁、轻质体量、采光充盈，与粗陋笨重的、男性的、工

业化视觉语汇截然不同。一方面以自然光线增加空间的通透感，减少压抑的、闭塞的等负面心理感受；除此之外，安全感也是以女性职员为主体的办公空间所需的基本空间属性。在看似矛盾的需求面前，赖特一方面创造性地采用了减少建筑外立面的窗户数量以塑造出完整的建筑实体观感，同时也以中庭天井的方式尽可能地引入自然光线的方式解决了上述两难问题，成为20 世纪初首个以性别要素作为设计考虑的办公大楼建筑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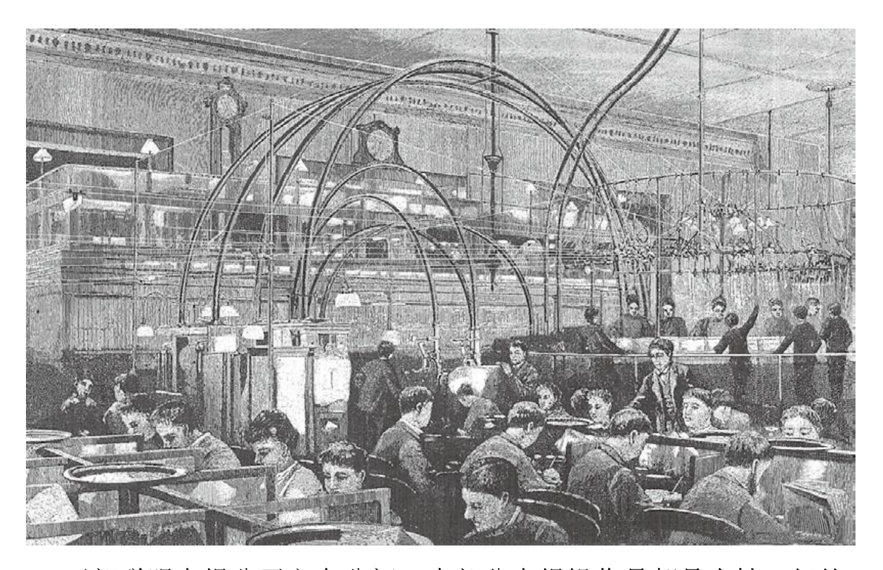


7. 拉金行政办公大楼（Lark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建筑外景与室内办公环境。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1875年之前，英国的办公室职员清一色为男性[24]，随着就业技术的推广和从业人员的基数增大，办公室职员的社会地位与薪酬待遇不断下降。与工人相比，文职不再是具有显着社会优越感的职业，于是薪酬成本较为低廉的女性开始大量补充其中。最早的电话接线员也都是男性，直到19世纪80年代被女性取代；一个世纪之后，几乎90% 的电话接线员都是女性[25]（图8）。另外，19世纪80年代，随着打字机等新型办公室设备的引入，打字员这一新的文职工种的出现成为女性进入办公室工作的敲门砖。从此之后，女性群体迅速取代男性，成为办公室文职人员的主流性别群体；19世纪90年代末，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办公空间采用男女职员分处两室的做法[26]，尽力为人数居多的女性职员提供更人性化的办公环境，隐私性与“男女有别”的性别观念曾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社会意识。（图9）20世纪初，行政秘书类工作逐渐成为女



性化职业，一方面来自于女性群体自身的工作意愿，另一方面雇主也更倾向于雇佣薪金水平较低的女性员工来担任此类工作。[27]“1911 年的英国办公室文职人员总数中，女性占据了 3/4 的比例。”[28]



8. 西部联盟电报公司主办公间，大部分电报操作员都是女性。纽约，1889 年。图片来源：早期办公室博物馆在线档案。





9.1896 年， 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办公楼内部实行以性别分区域的办公空间规划。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来自纽约城市博物馆， 拜恩（Byran）系列收藏品， 编号：93.1.1.6910。

办公室的空间大小以及家具类型会影响到员工的自我身份认知，因为空间与设备作为线索，常被解读为“能力、地位以及人际关系的表征”[29]。在以父权制为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形态中，基于性别二分的空间划分系统将女性归属于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领域，而男性则掌控以社会为主的公共空间。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与男性处于相同的工作空间时，公共场所的相对私密性成为新的特权形式。对空间的自主划分权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灵活的资源掌控权。空间的独立性和私密性与信息密级成正比，与信息流通级数成反比；也就是说，信息的传播路线一般是由密闭空间向开放空间流动，由男性雇员向女性雇员传达。隐私权、光线、空间配置权的多寡直接与个人身份相关联：由于女性通常从事着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例如接待员、文秘、后勤等，一般处于办公室空间的入口或中间的地方，使得上层领导可以随时快捷方便地找到她们；由于处于空间中部或入口处，缺少户外的自然光线，



只能较多地依靠人造灯光的使用；与男性高层管理人员的独立办公空间相比，隐私权对于身处基层工作岗位的女性职员而言也是另外一种很难获取的优越资源。另外，女性职员所占据的平均空间面积与她们的薪金一样，也远低于她们的男性同行。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金融行业是最典型的"性别区隔空间"，"经理清一色是男性，而行政办公人员绝大多数是女性……除了办公空间的物理隔断之外，男女雇员日常工作的交流与沟通也很疏离"。[30] 女性白领雇员的工作空间主要集中在"开放的"楼层与位置，相反"男性工作空间的私密性就要好很多"。[31] 大量研究认为，尽管职位，而非性别，才是员工办公空间位置排列的首要参考因素，然而现代白领阶层的职位系统实质上仍然是"基于性别的社会劳动分工"准则的产物，因此，从办公室内部的空间分配来说，性别化的特征还是相对明显：女性员工多居于办公室格局中的开放空间或边缘位置。美国犹他大学教授桑德斯托姆等人的研究表明，职业等级的高低与办公空间的私密性成正比：大概 75% 的秘书（大部分为女性）需要共享办公室；55% 的图书管理员、会计等共享办公室；只有 18% 的中高层管理人员（2/3 为男性）共享办公室。[32][33]秘书等女性主导的职位与高级管理人员等男性主导的职位相比，前者在物理空间的私密性权利上配比最低，后者最高。

20 世纪以来，办公室室内空间的规划设计及其家具设备的配用等，都普遍遵循两种线路：高级别员工的办公环境呈现等级化与符号化特点，而普通员工的办公空间则表现出明显的模块化、集约化的设计原则。空间的位置、布局、光线、设备、装饰等都具有明显的等级与符号差异。（图 10）"私密隔离的、与外部空间联通的、大尺度办公桌、独立卫生间、木制书柜、价值不菲的艺术品"[34] 等都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办公空间属性；级别较低的普通职员，他们的办公环境往往具备开放、与外部环境相对较远、模块组合等特点。模块化、集约化的空间与设备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强化企业主的统一管理与调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成本，便于日后进一步灵活调整。这种棋盘布局的空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工厂的生产装配流水线的形式特点，突出团队合作的空间语义，用标准代替风格，用共性取代个性，从而也符合泰勒主义关于科学化管理的精神原旨。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等级性突出的、符合科学管理原则的、功能效率为导向的传统办公空间格局，逐渐被市场所淘汰。





10. 上图为芝加哥录音机公司地区经理的独立办公空间， 照片摄于1941 年；下图为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会计部门基层职员的办公空间，照片摄于1940 年。图片来源：根据办公室博物馆在线档案整理。

因此，英文的“等级”（Hierarchy）一词在很多时候被解读为“有层次的”、“差异化的”、“有层级变化的”、“有逻辑秩序的”空间诉求或组织构架，号称与“办公室权力或政治无关”[35]，而是理性方法论的产物。以位于康涅狄格州格罗顿市的辉瑞全球研发药物创新实验室的办公空间设计为例，该空间采取了层级化设计思路，既是为了体现企业取值内部“命令链条”的逻辑与方向，也是为了更好地呈现有利于制药学领域创新的特色工作流程。[36] 如前文所述，起源于德国20世纪60年代末的“办公室景观”（Office Landscape）的设计方法，自由、灵活、开放是其主要特点。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办公效率及其交流效果，根据实际交流的需要制定办公空间的格局规划，以实现最佳工作流程与移动路径。“景观式办公空间”至少在两个方面符合环境行为心理学的基



本理论：第一，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令人愉悦的工作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益；第二，对工作环境有自主控制权的员工对雇主有更亲密的认同感，因此能发挥更大程度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从空间配置方面消弭普通员工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可视差异的方式一度被认为是“去等级化”、倡导自由平等意识形态更新的产物，然而在达菲等人的研究看来，等级化的差异仍然存在于各种办公空间的各种细节之处：家具的细部造型、材质、摆设、方位等。[37]

**三、当代办公空间设计的两种思路：环境行为心理学与企业身份**

现代办公室设计的三重目标曾被归纳为：“提高高效的办公功能，提供舒适的员工体验，保障伴随公司成长与变化的空间灵活性。”[38] 不论是工厂还是办公室，尽管具体形式不尽相同，但两类场所的本质属性是一致的——都是工作的物理环境，因此对于两者设计的方法原则，也已经达成基本共识：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率。围绕这一目标，办公室设计的主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探讨何种设计最能体现工作的属性；二是不断实践何种设计最符合员工的行为模式、心理需求、精神满足以及身份认同，从而更好地投入工作当中。换言之，将雇主与雇员、效益与满足等矛盾双方也包涵在内，办公室设计有待处理的主题体现在三个方面：工作、人、以及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1. 行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20世纪40年代初，薪酬、福利、晋升等机制被视为企业吸引员工的传统资源，而办公空间及其设计则很少被视为企业的有形资产[39]；但这种观念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得到迅速改变。英国设计史家弗蒂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西方社会的行政人才市场供过于求，改善雇员的工作环境、对已有办公空间进行重新装修或设计改良成为当时吸引人才的主要手段之一。[40] 直到今天，办公室设计对人才的吸引以及企业整体文化形象的传达仍具有无法忽视的优越性。办公空间具有已被广泛证明的“场所效力”[41]，用来改善工作环境的投入，是企业用来优化员工表现的最有效投资之一。到了20世纪60年代，空间与行为的关系，逐渐进入环境心理学家的研究视域。“所有的社会互动都会被其所处的物理环境所影响。”[42“] 物理环境规定了行为模式的背景，它表征了社会规则、习惯及其主流期望的部分特征，亦可用来定义社会交往的性质。”[43] 实证主义研究者已经发现，基于办公用途等工作场所的物理空间设计，将对员工的认知、行为、情绪以及心理等层面产生潜在且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



方式、群体凝聚力、友谊的形成方式、亚群体等”。[44] 研究认为，人们对某一环境的偏好与好感，主要通过以下三种维度来实现：“复杂性、神秘性以及关联性”。[45]

空间设计的复杂性主要指涉视觉感知的丰富程度、装饰物类型以及所涵盖的信息级别等，它有利于激活人们的情感接受；而关联性则代表了秩序、清晰以及整体感，有利于强化人们对于空间整体情感感知的正面评估。[46] 环境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空间设计更倾向于自然元素而不是人造感太明显的设置（包括布局与物），因为前者代表了天然的秩序感与完整性，而后者则被视为对空间整体感的破坏。开放的空间与组合的家具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办公空间的主流形制，也是因为有利于表现出统一的空间整体以及模拟了自然界环境。在美国城市规划设计师怀特的经验研究发现，人们的行为模式，特别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女性行为，是丈量评价空间设计质量的最直观方式。[47] 人们的脚只会选择那些方便的、舒适的、宜人的空间行走。另外，美国密歇根大学瓦因曼博士的研究还指出，细微处的设计改造即能很大程度地提升用户体验，增加公共空间的功能性及其利用率。[48]

研究表明，物理环境对个人心理的干预一般导致两种行为模式：趋近式行为或避免式行为。[49] 前者包括空间对行为产生的所有积极效应，比如高效、放松、归属感等；后者则所指相反，即所有消极反应，诸如厌恶、懒散、紧张等。环境对员工心理以及行为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工作的满意度、对职业的幸福感、以及对企业雇主的忠诚度等几个方面。[50]

2. 办公空间：企业身份的符号系统

办公室等服务行业的实体空间的功能而言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影响行为，一种是创建形象”[51]。通过对空间环境中各种要素人为控制与设计：光环境、声环境、色环境、物环境以及空间环境包括布局规制、路线引导等，对内实现对员工行为的高效化组织与有效化引导，从而对外创造出符合企业发展立位与战略方向的整体文化形象。20 世纪 90 年代，中央商业区域的空间属性与其工作性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新时代特点：“创意的、反思的、灵活的、问题导向的、自治的、正规、客户为中心的。”[52] 这些新特点的出现，不仅是企业组织结构更新的结果，也是社会进化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设计创新的产物。就办公室这一企业存在元素看来，物理层面的设计与非物质层面的改造息息相关，两者互为促进关系。达菲将办公室的设计创新视为从根本上改造企业与组织整体形象、打造整体化企业文化、以及输出其核心价值观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办公室设计使得组织能够掌控企业变革过程，设计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强大、最



持久、最可持续性的媒介与途径；没有任何一种沟通手段比物理环境更有表现力地、更强烈地、更稳定地表现出企业的价值观与发展愿景。”[53]

办公空间的设计不仅生动言说了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成败”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正如一句话所说的那样，“如果物理环境因素没有被考虑在内，组织变革过程则可能失败。”[54] 研究表明，办公空间的符号化设计策略对雇员的影响力要远小于对公司文化的塑造作用[55]，例如办公空间设计精心呈现的企业文化对来访者、客户等非企业人员的效用更为明显[56]，属于显性符号系统，但对于内部员工而言，符号系统的意义阐释机制则大部分失效了。

尽管办公空间并非企业产品及其服务生产与制造的第一现场，但它的存在及其方式却对客户对其企业产品及其服务质量的感知效果、满意程度、认知水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诸多学者[57][58] 的定量研究证实。不论办公空间的诸多设计是否为了凸显统一清晰的企业形象而故意为之，客户群体在进入企业办公空间时总会潜意识地寻找了解企业信息的细节线索[59]；尤其在客户与员工共同参与的服务空间类型里，例如机场、酒店、银行、学校、图书馆、医院等，由于办公空间本是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场所，对外宣传并非其主要职能，因此也更被客户视作企业状态的真实表征之一。

**结语**

以效率为代表性诉求的现代性，以及以性别差异为典型的等级性，在当代以及未来办公空间的设计趋势里，将以“暧昧气质的公共空间”作为主要呈现形式。宏观层面上，它仍然言说的是男性气质明显的、社会空间的精英文化。以办公室作为文本，现代性在空间、家具、光环境、装饰等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显现出它独有的理性魅力；微观层面上，在办公空间的诸多设计实践里，各种无法规避的等级性被设计转化为柔性的、彰显多元主义价值的各种差异，职位的、行业的、种族的、性别的、年龄的……各种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不再那么肆无忌惮地呈现于视觉表面了。

奥尼尔等人曾在针对悉尼中央商业区域办公空间的研究指出，“悬而未决的公共性”是当代新型办公空间设计的显着特点之一。[60] 对内而言，办公室设计最大程度地消融边界与隔离，致力于打造整体化的通透感，在企业内部形成黏滞的团队关系与统一的组织凝聚力；同时对男女两种职员而言，空间的划分、位置的规划、光线条件、隐私性等仍有显在的差距；对外而言，当代办公空间设计仍然旨在营造出社会精英人



群专属的社交与工作场域。

注：

[1] Jeremy Myerson： After Modernism： The Contemporary Office . McKellarS， Sparke P， eds. Interior Design and Identit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91.

[2] Francis Duffy： The Responsive Office： People and Change， Streatley onThames： Berks Polymath Ltd， 1990， p7.

[3] Francis Duffy： The Responsive Office： People and Change， Streatley onThames： Berks Polymath Ltd， 1990， p7.

[4] James Woudhuysen： Tayloring People for Production， Design， 1984， August： 34–37.

[5] Adrian Forty： 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86， p120.

[6]Lee Galloway： Office Management： I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New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19， p75.

[7]Adrian Forty： 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86， p121.

[8]Adrian Forty： 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86， p133.

[9]David Tong： "Sick Buildings"： What are They and What is Their Cause?Facilities， 1991， 9（7）： pp9–17.

[10]David Tong and Adrian Leaman： Sick Building Syndrome： Strategies andTactics for Managers， Facilities， 1993， 11（4）： pp19–23.

[11]Jeremy Myerson： After Modernism： The Contemporary Office . McKellarS， Sparke P， eds.Interior Design and Identit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93.

[12]Jeremy Myerson： After Modernism： The Contemporary Office . McKellarS， Sparke P， eds.Interior Design and Identit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94.[13]Jeremy Myerson： After Modernism： The Contemporary Office . McKellarS， Sparke P， eds.Interior Design and Identit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97.

[14]《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一版），商务印书馆，北京，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88，第 779 页。[15] L e C o r b u s i e r： T owa r d s a N ew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N ew Y o r k： D o v e rPublications， 1985（1946）， p83.

[16]"办公室景观"（英语 office landscape； 德语 Bürolandschaft），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德国，代表了办公室开放空间设计运动。开放式的办公空间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泰勒主义时期即开始存在，与此不同的是，"办公室景观"致力于创造一种"更具协作性以及更为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参见维基百科：http： //en.wikipedia.org/wiki/Office_landscape



[17]Einar De Croon，Judith Sluiter，P Paul Kuijer and Monique Frings–Dresen ：The Effect of Office Concepts on Worker Health and Performanc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Ergonomics ，2005，48 ：2，pp119–134.
[18]Leslie Weisman ：Discrimination by Design ：A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ManMade Environment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4.
[19]Linda McDowell ：Capital Culture ：Gender at Work in the Ci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1997，p42.
[20]Mona Domosh ：Corporate Cultures and the Modern Landscape of NewYork City . Kay Anderson and Faye Gale，eds. Inventing Places ：Studies inCultural Geography ，Melbourne ：Longman，1992，pp72–85.
[21]Phillip M. O'Neill and Pauline McGuirk ：Reconfiguring the CBD ：Workand Discourses of Design in Sydney's Office Space，Urban Studies ，2003，40 ：pp1751–1767.
[22]Linda McDowell ：Capital Culture ：Gender at Work in the Ci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1997，45.
[23]Chrysanthe Broikos，Donald Albrecht ：On the Job ：Design and theAmerican Office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2000，16.
[24]Adrian Forty ：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London ：Thames & Hudson，1986，p140.
[25]Joan Wallach Scott ：The Mechanization of Women's Work，ScientificAmerican ，1982，247 ：pp166–187.
[26]Chrysanthe Broikos，Donald Albrecht ：On the Job ：Design and theAmerican Office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2000，21.
[27]Daphne Spain ：Gendered Spaces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of North California Press，1992，p203.
[28]Adrian Forty ：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London ：Thames & Hudson，1986，p142.
[29]Mary Jo Bitner ：Servicescapes ：the Impact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onCustomers and Employees，Journal of Marketing ，1992，56（2）：pp57–71.
[30]Barbara Baran and Suzanne Teegarden ：Women's Labor in the Office ofthe Fu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Lourdes Beneria andCatherine R. Stimpson,eds. ：Women，Households，and the Economy ，New Brunswick，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7，pp201–224.
[31]Daphne Spain ：Gendered Spaces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of North California Press，1992，p206.
[32]Eric Sundstrom，Robert E. Burt and Douglas Kamp ：Privacy at Work ：Architectural Correlations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Performance，Academy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0，23 ：pp101–17.
[33]Eric Sundstrom ：Privacy in the Office ，Jean D. Wineman，eds. ：Behavioral Issues in Office Design ，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1986，pp177–202.

[34]Jeremy Myerson： After Modernism： The Contemporary Office . McKellarS，Sparke P，eds.Interior Design and Identit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p197–198.

[35]Diane Stegmeier： Innovations in Office Design： The Critical InfluenceApproach to Effective Work Environments， New Jersey：John Wiley & Sons，Inc.，2008，p163.

[36]Diane Stegmeier： Innovations in Office Design： The Critical InfluenceApproach to Effective Work Environments， New Jersey：John Wiley & Sons，Inc.，2008，pp166–169.

[37]Francis Duffy：Bürolandschaft，Architectural Review，1979，CLXV（983）：pp54–58.

[38]John Pile： A History of Interior Design， London：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Ltd，2000，p400.

[39]Franklin D. Becker： Creating environments in organization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81，p130.

[40]Adrian Forty： 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London： Thames & Hudson，1986，p142.

[41]Diane Stegmeier： Innovations in Office Design： The Critical InfluenceApproach to Effective Work Environments， New Jersey：John Wiley & Sons，Inc.，2008，p163.

[42]David Bennett and Judith Bennett： Making the Scene，Gregory Stone， Harvey Farberman eds.： Social Psychology Through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Waltham，MA：Ginn–Blaisdell，1970，pp190–196.

[43]Joseph Forgas： Social Episodes： the Study of Interaction Routines， London： Academic Press，Inc，1979.

[44]Eric Sundstrom and Mary Sundstrom： Work Places： The Psychology of thePhysical Environment in Offices and Factories， 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6.

[45]Stephen Kaplan： Aesthetics，Affect，and Cognition，Environment andBehavior，1987，19：pp3–32.

[46]Jack Nasar： Perception，Cognition，and Evaluation of Urban Places， IrwinAltman and Ervin Zube. eds. Public Places and Spaces， New York： Plenum Press，1989，pp31–56.

[47]William Whyte：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 Washington，DC： Th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1980.

[48]Jean D. Wineman，eds.：Behavioral Issues in Office Design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1986.

[49]Albert Mehrabian and James Russell： An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Psychology， Cambridge，MA：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74.

[50]Carolyn Youssef and Fred Luthans：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the Workplace： The Impact of Hope，Optimism，and Resilience，Journal ofManagement，2007，33：pp774–801.

[51]Mary Jo Bitner：Servicescapes：the Impact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onCustomers and Employees，Journal of Marketing，1992，56（2）：p57.

[52]Phillip M. O'Neill and Pauline McGuirk： Reconfiguring the CBD： Work andDiscourses of Design in Sydney's Office Space，Urban Studies，2003，40：pp1751–1767.



[53]Francis Duffy ： Managing Workspace.An address presented to the Sydney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ouncil ， ANAHotel March， 2001.

[54]Lizabeth Barclay and Kenneth York ： Space at Work ： Exercises in theArt of Understanding Physical Indicators of Culture.Journal of ManagementEducation ， 2001， 25（1）：pp54–69.

[55] I r i s V i l n a i – Y a v e t z， A n a t R a f a e l i a n d C a r y n S c h n e i d e r Y a a c o v ： Instrumentality， Aesthetics， and Symbolism of Office Design. Environmentand Behavior ， 2005， 37（4）：pp533–551.

[56]Mary Jo Bitner ： Servicescapes ： the Impact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onCustomers and Employees， Journal of Marketing ， 1992， 56（2）：p68.

[57]Mary Jo Bitner ： Servicescapes ： the Impact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onCustomers and Employees， Journal of Marketing ， 1992， 56（2）：pp57–71.

[58]Gilbert Harrell， Michael Hutt， and James Anderson ： Path Analysis ofBuyer Behavior Under Conditions of Crowd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 1980， 17 ： pp45–51.

[59]Mary Jo Bitner ： Servicescapes ： the Impact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onCustomers and Employees， Journal of Marketing ， 1992， 56（2）：pp57–71.

[60]Phillip M. O’Neill and Pauline McGuirk ： Reconfiguring the CBD ： Workand Discourses of Design in Sydney's Office Space ， Urban Studies， 2003， 40 ： p17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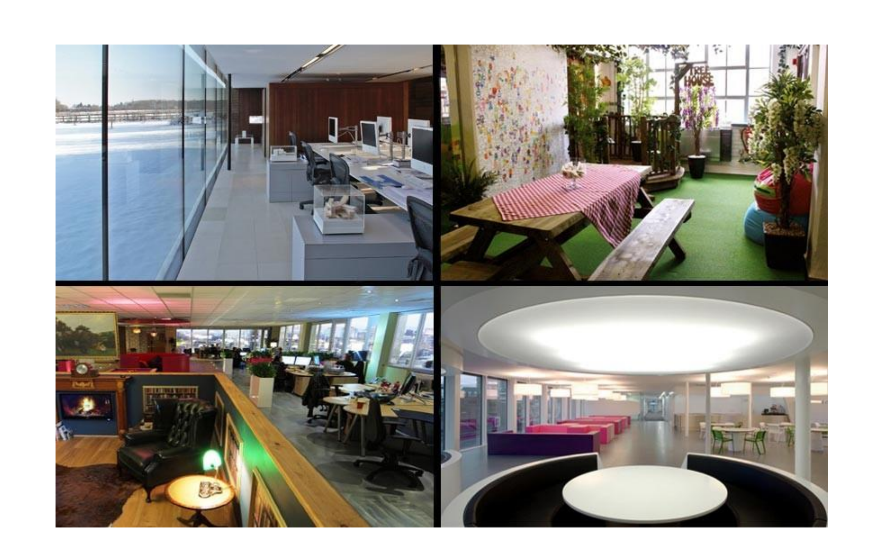
(本论文已全文发表过，此是二次发表，原文首次发表在《装饰》杂志 2012 年第 11 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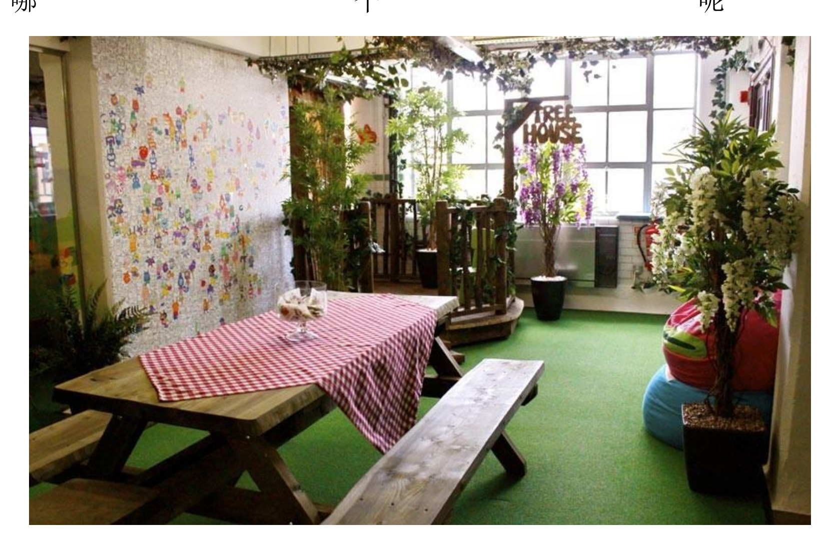


## 10-6 图片：译言网：英国十大最酷办公室

文章来自译言网，译者龚蕾，原文来自《英国每日电讯报》



1、你知道在英国最酷的办公室吗？一个搜索网站求职网站新思路（Adzuna）已经发布了英国最酷的十大办公室，从尼古拉风格建筑师的禅意，可以俯瞰湖水的宁静的环境，还有红牛（Redbull）主题风格公园的房间、会议室、放映室、乒乓球馆等。你最喜欢哪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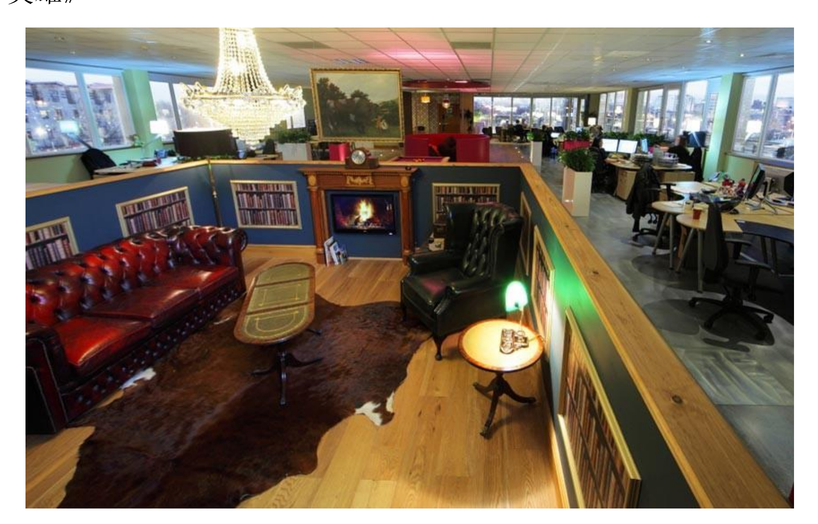

2、儿童网游公司 Mind Candy

职位空缺数：23

地点：伦敦肖尔迪奇（Shoreditch）

为什么他的办公室很酷呢：这是一家儿童网络游戏公司，在公司的小办公室里，可以播放每一个你能想得到的玩具。工作人员可以在这里放松，也可以玩音乐游戏《吉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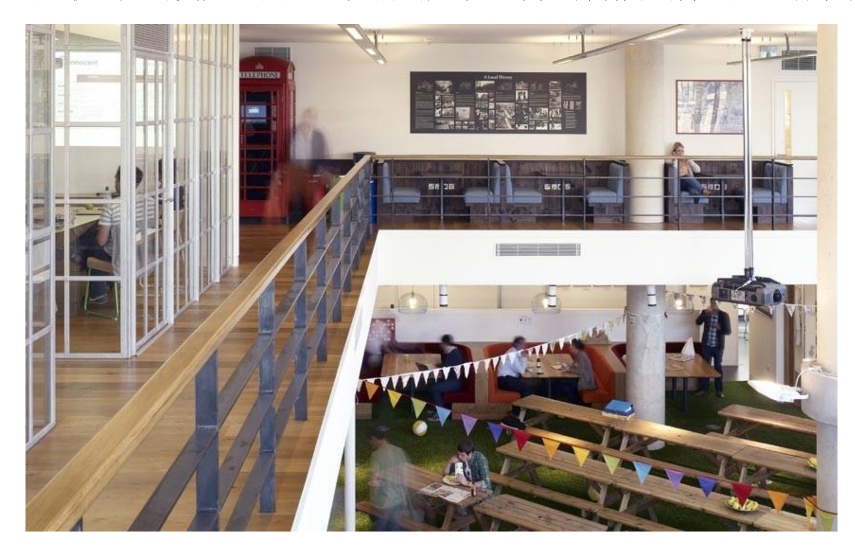
英雄》



3、墨尔本服务器托管 IT（Melbourne Server Hosting）公司

地点：曼彻斯特

为什么办公室很酷呢？服务器托管公司是一个家族经营的 IT 公司，公司相信他们的员工是最重要的资产。因此，他们创建了这个充满活力的办公室，体现团队的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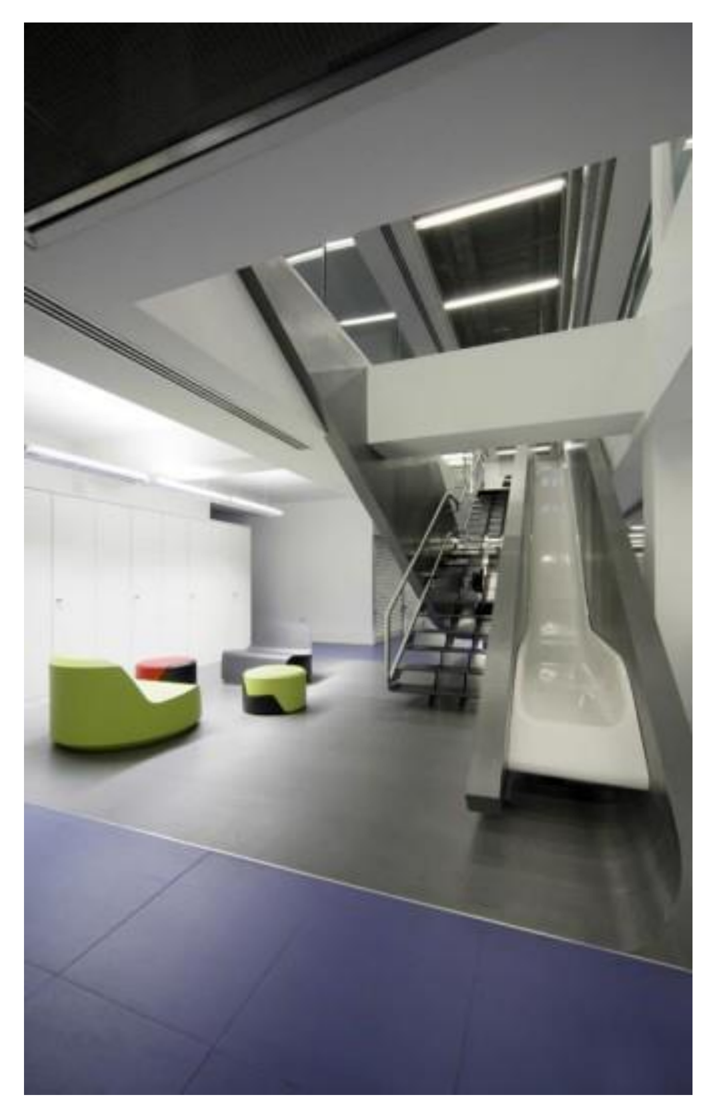

4、思慕雪饮料制造商（Innocent Drinks）

职位空缺数：4 个

地点：伦敦绿林墓园（Kensal Rise）

为什么办公室很酷呢？人们亲切地称为“水果塔”，办公室里挂满了人造草坪、野餐

桌、还有典型的英国红色电话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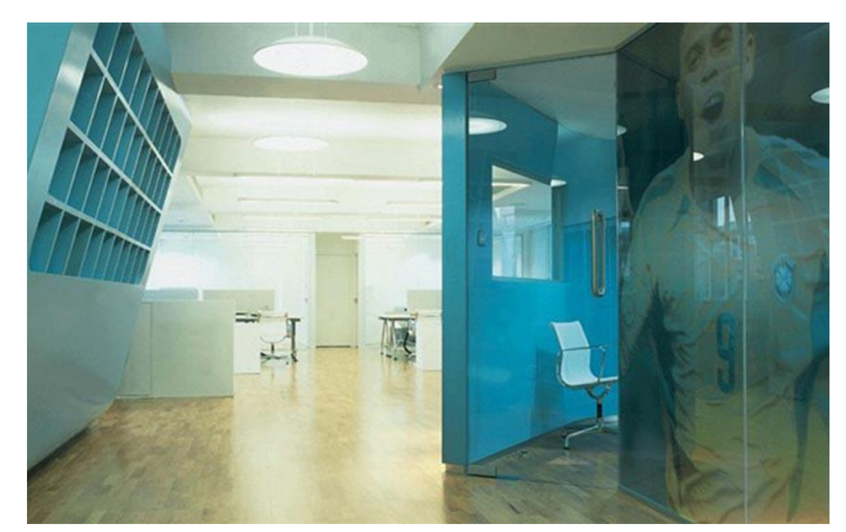
5、红牛

职位空缺数：31 个

地点：伦敦 Soho

为什么很酷呢？红牛的伦敦总部，由 Jump Studios 工作室设计，表现出现代设计与情

趣，谁不希望办公室里有乒乓球会议室和巨大的幻灯片呢？



6、耐克

地点：伦敦牛津街

为什么很酷呢？耐克的伦敦办公室，由 Jump Studios 工作室设计，表现了现代和超现


实风格。你可以在每个墙面看电视，运动器材设备在每一个拐弯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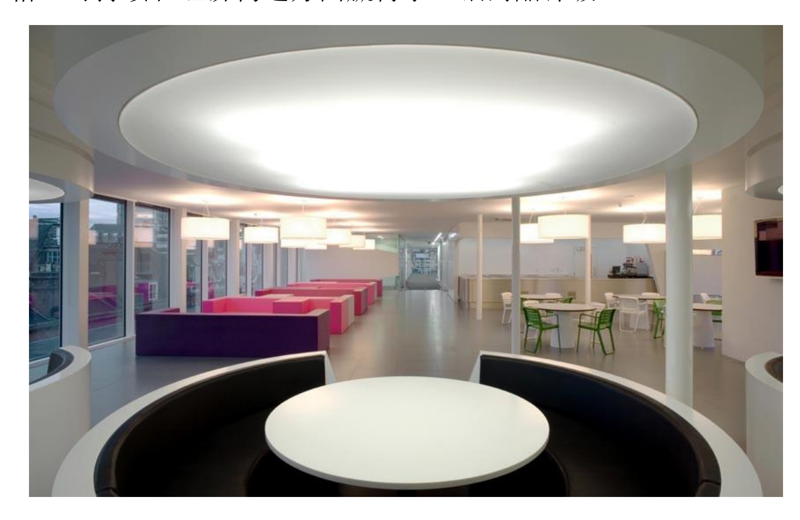
7、英国维珍集团（ Virgin Money）

职位空缺数：4 个

地点：爱丁堡

为什么很酷呢？维珍爱丁堡总部抢先获得了英国“最佳回收与翻新办公室”，建筑风

格、可持续和经济构造方面赢得了“银河酷评级”（Galactic cool ratings）。



8、发动机集团（The Engine Group 英国最大的私营传播集团）

地点：伦敦

职位空缺数：零

为什么很酷呢？这是伦敦通讯集团办公室，3.5 百万英镑的项目，包括了圆形的“座位群”，是用可丽耐（corian）做的，还有房间里用软木布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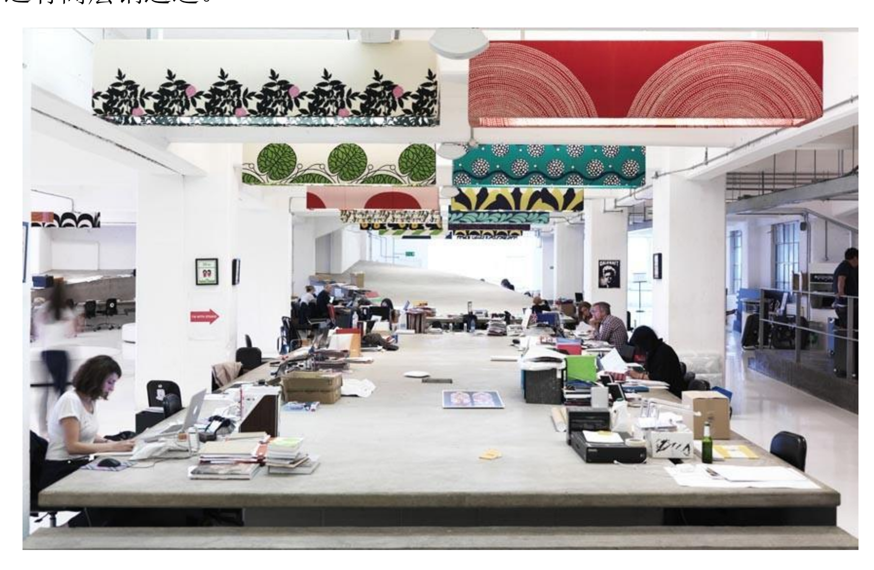


9、麦格理集团（ Macquarie Ropemaker）

职位空缺数：20 个

地点：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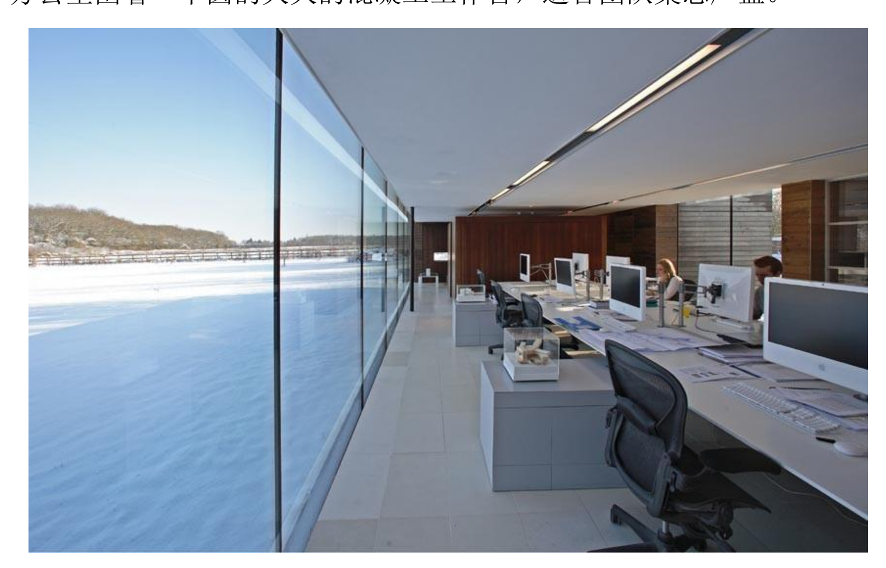
为什么很酷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家位于伦敦的银行集团占地 21.7 万平方英尺，在六层楼区，有一个开放的空间，色彩鲜明，象是蛋糕上的樱桃，红色的电梯，还有高层钢通道。



10、麦迪逊邦（ Mother London）

地点：伦敦肖尔迪奇（ Shoreditch）

为什么很酷呢：麦迪逊邦是一家英国广告巨头，在市区最酷的办公室里。整个公司的办公室围着一个圆的大大的混凝土工作台，适合团队集思广益。



11、长谷仓建筑工作室（ Nicolas Tye Architects）

地点：贝德福德郡

为什么很酷呢？贝德福德郡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全景室外，优美的环境，提供了创作的灵感，还有平和与安静。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 【交通空间】

抵达菲丽斯之后，你会十分欣赏运河上各式各样的桥：弯曲的、有遮盖的、有柱脚的、用驳船承托的、架空的、有雕花栏杆的。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临街窗子：直根的、摩尔式的、拱形的、尖顶的，镶嵌着半月形或者有玫瑰花纹的磨砂玻璃的；铺砌街道的物料也有许多种：鹅卵石、石板、碎石子和白色的瓦砖。到处都有使人诧异的景色：伸出堡垒墙头的一丛刺山柑、梁柱上三个皇后的雕像、洋葱形圆屋顶上串着三个小洋葱的尖顶。“能够天天看到菲丽斯并且观赏城景的人有眼福了，”你这样说着，同时为了必须离开这个还不曾看够的城而懊恼。

其实，情形恰好相反，你发觉自己不能不在菲丽斯住一段日子。你眼前的城很快就褪了色，玫瑰花纹的窗子、梁柱上的雕像、房屋的圆顶都消失了。像其他菲丽斯居民一样，你走过曲曲折折的街道，辨认阳光的地方和阴暗的地方、这边一扇门、那边一段梯级、一条可以让你放下篮子的板凳、走路不小心就会踩进去的地洞。城的其余部分是看不见的。菲丽斯是一个空间，它的街道是虚无中各点之间的连接线，无须经过某个债权人窗前便可以抵达某个商人的篷帐的、最快捷的路线。你的脚步所追随的不是肉眼可见的事物而是心眼所见的、掩埋的、抹杀了的事物。假如你觉得两个拱廊中之一个比较愉快，那是因为三十年前有一个穿着绣花的宽袖衣服的女子在那里走过，又或许是因为这拱廊在某个时刻反射的阳光使你想起什么地方的另一个拱廊。

千万只眼睛仰望窗户、桥、刺山柑，它们也许在看一张白纸。像菲丽斯这样的城很多，它们躲过一切人的眼睛，可是躲不开那出其不意来临的人。

——摘自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 10-7 阿兰·德波顿：机场里的小旅行——入境大厅（节选）



不论是什么，我们都不免忘记：读过的书、日本的庙宇、卢克索的陵墓、航空公司柜台前排队的队伍、我们自己的愚蠢。于是，我们又会逐渐把快乐寄托于家乡以外的异地：一间窗外能够眺望港口景观的旅馆房间，一座号称埋有西西里殉道者阿加塔遗骸的山顶教堂，一栋四周围绕着棕榈树的小屋，附有免费招待的自助晚餐。不久之后，我们又会再次想要收拾行李，想要盼望，想要尖叫。再过不久，我们就又必须重新学习机场带给我们的重要教训。



阿兰·德波顿：英国作家，毕业于剑桥大学，现居伦敦，为《机场里的小旅行》一书作者。

按：机场原本只是旅行中的过渡性空间，发生的不过是“出发”与“抵达”，但在阿兰·德波顿的眼中，却成为了一个综合各种文化面貌的博物馆。

2009 年夏天，阿兰·德波顿获邀担任英国希斯罗国际机场的“首位驻站作家”。他可以结识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访谈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安检人员、飞行员、首席执行官，乃至机场牧师；他还可以在出境大厅、入境大厅、机场限制区和机场酒店随意进出，德波顿以他独特的视角探索着机场这个熟悉又神秘的“非场所”，观察着其中的奇妙与庸俗之处，以及旅客与员工的互动。

一周后，根据他的所见所闻，以他融合了风趣和智慧的一贯笔触，写出了这部非凡的跨界文化创意之作，探讨旅行、工作、人际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本质。让我们知道，待在机场里，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具启发性。

## 入境大厅

1

过去，我们抵达一个地点之前总是有许多时间可以预做心理准备，心绪可随着地理景观的逐步变化而转换：沙漠转为灌木丛、莽原转为草地。船只入港之后，接着卸载骆驼，入住一间窗外可望见海关大楼的房间，到汽船上交涉摆渡事宜。飞鱼掠过船体边，船员打着牌，空气中满是凉爽的气息。



现在，一个旅客可能星期二在尼日利亚的阿布贾，星期三就到了希思罗机场新航站楼的卫星站入口。昨天中午还在阿布贾的伍瑟区伴着西非杜鹃鸟的啼声享用油炸大蕉，今天早上 8 点已在一家科斯达咖啡分店旁的下机口看着机长关闭波音 777 客机的双引擎。

尽管身体疲惫不堪，感官却是活跃不已，不断接收着周遭的一切——明亮的灯光、四面八方的标志、光亮的地板、深浅不同的肤色、金属般的声响、五颜六色的广告——所有感官经验都极为鲜明，仿佛吃了药，又像新生儿，或有如托尔斯泰一样。突然间，家乡仿佛是个完全陌生的地点，一切的细节都因为对比于个人刚见识过的他乡景观而显得新奇无比。和奥布杜山丘上的黎明相比较，眼前这道晨光显得多么奇特；和大阿特拉斯山上的风声比较起来，回荡在机场里的广播声响显得多么怪异；在卢萨卡街道市场的嘈杂声响仍然萦绕于耳际的情况下，两名女性地勤人员相互交谈所使用的英语听起来竟是那么陌生（她们自己一定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这种清澈无比的感受让人迷恋，让人不禁想要一再以异国的种种——例如突尼斯或海得拉巴的景象——对比于家乡的一切，让人永远不想忘却身旁的一切其实一点都不寻常。威斯巴登与洛阳的街道各不相同，我们的家乡只是缤纷多元的世界的其中一员而已。

2

在航空发展的短暂历史上，能够满足旅客期待的机场建筑并不多，尤其“抵达”这项行为的重要性更是难以充分表达。过去，前往圣城的旅人一旦穿越了酷热的谢费拉平原与盗匪充斥的犹大山丘之后，总是能够获得耶路撒冷以宏伟的雅法门郑重欢迎。尽管现代少有机场懂得学习这个榜样，第五航站楼却勇于一试。

在希思罗其他比较老旧的航站楼里，第一件映人眼帘的事物大概就是地毯，融杂了青、黄、褐、橙等颜色，到处遗留着呕吐物以及让人联想起酒吧或医院的残迹碎屑。相对而言，第五航站楼里触目所及都是利落美观的合成瓷砖；走廊光线明亮，侧边安装着一片片玻璃，灰绿色的色调具有沉淀心灵的效果；厕所里设置了各种卫生用具，隔墙板与人同高，一扇扇门皆采用实心板材制成。

第五航站楼的建筑呈现了英国的新形象。这个国家将接纳科技，不再沉浸于自己的过往，也将充满民主、宽容、明智、活泼的特质，不再耽溺于怨气或嘲讽当中。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只要到第五航站楼西北方 20 公里处，即可发现那里的许多洁净小屋与破败庄园，丝毫看不到航站楼墙壁与天花板所象征的新思维。



尽管如此，就像杰弗里·巴瓦在科伦坡设计的国会大厦或是约恩·乌特松在悉尼设计的歌剧院，理查德德·罗杰斯设计的第五航站楼也是一座充满野心的建筑。这种建筑拥有创造认同的特权，而不只是单纯反映现状。这座航站楼希望利用旅客身处于这个空间里的一个小时左右，也就是护照接受盖章以及领取行李的时间，向他们传达英国将来有一天可能成为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当前常见的模样。

3

下了飞机之后，步行一小段路，入境旅客就会进入一座致力于淡化其权威色彩的大厅。这里看不到栅栏、枪支，或是安装着防弹玻璃的柜台，只有在天花板上挂着一块点了灯光的招牌，还有在地板上以花岗岩铺出一条线。在这里，政府的权力极为稳固，所以才有足够的自信保持低调，让出生于本国的人民不必感受到这种权力的存在。每天，清洁人员会到这里清理三次，游走于那条界线两侧，一边是国境之外的飞机起降地，另一边则正式属于英国境内。不论是英国的居民或访客，都可在跨过这条界线之后享受到商品丰富的药店、温和友善的蚊子、慷慨大方的图书馆借阅政策、污水处理厂与行人穿越道。

不过，护照一刷之下，只要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不合格的信息，这一切心照不宣的承诺就可能随即破灭。海关人员会召唤警卫前来，把这名不幸的旅客从入境大厅带到两层楼底下的一排房间。其中一间是儿童游戏室，这个房间内的陈设尤其令人不禁心伤：室内有一列玩具火车，还有乐高积木堆叠而成的城市景观，以及一盒卡朗达什笔。而且，每个拘留于此的孩童都可以把一盒点心和塑料制成的动物带回家。因此，在若干来自厄立特里亚或索马里的儿童心目中，英国将永远是他们记忆里惊鸿一瞥的国家，充满了香脆美味的零食点心和柳橙汁——一个极为富庶的国家，竟然能够免费送人数字式闹钟，而且那里的警卫还知道怎么组装玩具火车的木头轨道。儿童游戏室隔壁，在一间仅有简单桌椅的房间里，他们的父母则会见识到这个国家的另一方面，在警方的全程录音下对着一名面无表情的移民官员说明自己为何企图闯关入境。

4

有史以来，行李提取处向来就不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地方，但第五航站楼倒是极力扭转这种印象。

这座行李提取大厅的天花板相当高，水泥墙平整无瑕，还有充足的推车可供旅客使用。此外，行李的送达速度也非常快。输送带的制造商是荷兰的范德兰德工业公



司，原本从邮购与快递行业起家，现在已是全球行李物流界的领导厂商。长达 17 公里的输送带在航站楼底部不断运转，每小时可输送 12000 件行李。140 部电脑负责扫描标签，确认每一件行李的目的地，同时也检查行李内部是否装有爆炸物。这些机器对待行李的细心程度少有人能及：行李等待转机的时候，机器会轻柔地把它们带到一间宿舍里，把它们放在黄色的床垫上，任由它们懒洋洋地等待登机的时间——就像它们身在楼上休息室里的主人一样。等到旅客从行李提取大厅的输送带上提起旅行箱的时候，许多行李都已经历了远较其主人精彩得多的旅程。

尽管如此，和自己的行李重逢，不免带给人一股无可化解的忧郁情绪。旅客在空中毫无羁绊地飞行了几个小时，因为俯瞰着海岸与森林的美丽景观而对未来充满希望，但一站在行李输送带前面，就不禁又想起了人生中的物质方面与各种压力负担。行李提取大厅与飞机代表了某些基本的二元性——物质与心灵、沉重与轻盈、肉体与灵魂——其中负面的一端全都属于那一件件几乎没什么不同的黑色新秀丽旅行箱，在范德兰德公司设计精巧的输送带上不断滑行而过。

在行李输送带周围，一部部推车紧紧靠在一起，就像拥挤车阵中的车辆一样，丝毫不肯让出一分一毫的空间。尽管每一件行李箱的内容物都反映了引人人胜的个人特色一这一件也许装着青色比基尼和一本还没看过的《文明及其不满》，那一件也许装着从芝加哥一家旅馆偷来的浴袍和一盒罗氏药厂出品的抗忧郁药物——但每个人在这里都绝对没有时间想到别人。

5

然而，行李提取大厅只是前奏曲，机场真正的情感高潮还在后头。任何人，不论多么孤独寂寞，不论对人类多么悲观，不论多么看重金钱，终究都不免盼望自己重视的人会在入境大厅迎接自己。

就算你心爱的人已经表明自己当天必须忙于工作，就算对方说他不喜欢你出远门，就算对方已在去年 6 月和你分手，或是早在 12 年半以前就已去世，你还是不禁觉得他们可能会来接机，就只为了给你个惊喜，让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每个人小时候一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否则我们绝对活不到现在）。

因此，我们走向接机区的时候，实在很难决定自己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我们如果就此抛弃自己平时走在陌生环境里的那种严肃又充满戒备的神情，未免太过莽撞，但至少应该让脸部保有露出微笑的可能性。我们也许会因此呈现出乐观又暧昧的表情，就像员工听着老板讲笑话，等待着笑点出现的那种模样。



所以，我们一旦在穿越入境走道的12秒间扫视了两旁的群众，结果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孤独一人，唯一的去处只有希思罗机场快线列车售票机前的购票队伍，这时我们必须具备多么强烈的自尊，才能够不显露出一点点的迟疑。就在我们身旁两米处，一个衣着轻便，也许以担任救生员为业的年轻男子，刚刚在一阵欢呼声中与一名真诚而体贴的年轻女子相遇，两人现在正深情拥吻，这时我们必须多么成熟，才能够不在乎眼前的这幕景象。此外，我们又必须多么务实，才能够不盼望暂时摆脱这个令人厌倦的自己，而成为刚从洛杉矶飞回英国的加文——他在斐济与澳洲度了一年假之后，现在他热情的父母、兴奋的阿姨、雀跃的妹妹和两名女性朋友全聚集在入境大厅，拿着气球迎接他，待会儿就将带着他一同返回伯明翰南部市郊的家里。

在入境大厅里，有些人获得的热烈迎接足以让国王嫉妒，甚至连当初威尼斯为了迎接从东方丝绸之路归来的探险家而举办的庆祝活动都比不上。一个个没有崇高地位或突出特征的人，在22小时的飞行期间只是毫不显眼地坐在紧急逃生口旁的座位上，这时却抛开了羞怯的模样，成为各种旗帜标语和自家烘焙的巧克力饼干的欢迎对象。在这些人身后，大企业的总裁则准备搭上冷冰冰的豪华轿车，前往高级饭店装饰着大理石与兰花的大厅。

由于离婚现象在现代社会极为普遍，于是机场里也就随时都可见到父母与孩子团聚的场景。在这种时刻，再也没有必要假装理智或冷静：这时就该紧紧拥住一双脆弱而圆润的肩膀，呜呜咽咽地啜泣起来。我们在职场上也许随时都必须表现出坚强刚硬的模样，但人类终究仍是极度脆弱而且容易受伤的动物。我们对身周的千百万人虽然大多视而不见，但其中总是有少数几人掌握着我们的快乐。我们只要嗅到这些人的气味就可以认出他们是谁，没有了他们甚至活不下去。有些男子在入境大厅里面无表情地来回踱步。他们期待这一刻已有半年之久，一旦见到一个和自己有着同样灰绿色眼珠、脸颊和母亲一样红润的小男孩，牵着机场服务人员的手从不锈钢门后面走出，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在这种时刻，感觉就象是自己逃过了死神的追杀——不也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永远都能这么骗过死神。也许这正是一种面对死亡的练习。多年后的某一天，长大成人的孩子将会在例行出差之前向父亲道别，然后短暂的寿命就会突然结束。这个孩子将在墨尔本一间位于20楼的旅馆房间内接到一通午夜的电话，得知自己的爸爸在地球的另一端突然发病，医生已经无能为力。自此之后，对于这个长大成人的孩子而言，入境大厅里的人群中将永远少了一个他熟悉的脸庞。

6

不是所有的接机过程都那么感人。机上的一个旅客也许来自上海，抵达机场之后便与马尔科姆和迈克一同开车前往伯尔尼茅斯，打算利用暑假期间上英语课程：在码头边一幢房子里旅居两个月，接受一名家教的指导，学习“ought”的发音，并且企图精通商务英语——这种能力将有助于他们日后进入珠江三角洲的半导体或纺织业里工作。

另一侧，穆罕默德则是等待着来自旧金山的克里斯的班机。穆罕默德出生于巴基斯坦拉合尔，现在住在伦敦近侧的绍索尔；克里斯则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现在住在硅谷——不过，这两人并不会知道彼此的这些人生细节。在这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一个人竟能轻易和另一个人一同默默乘坐在一辆黑色梅赛德斯 S 级轿车里，实在是相当奇特的现象。对于司机和乘客而言，只要对方不是杀人犯或小偷，这趟旅程就算是顺利成功。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里，只有偶尔响起的导航语音会打破车里的静默。最后，梅赛德斯轿车终于抵达金丝雀码头一幢以玻璃饰面的办公大楼。克里斯在这里下车，准备参加一场研讨金融信息储存议题的会议；穆罕默德则是把车开回航站楼，准备展开另一趟旅程。这一次的目的地是肯特郡，搭乘的对象是来自成田机场的 K 先生，和克里斯一样神秘寡言。

7

许多比较普通的团聚景象令人不禁纳闷其中的兴奋之情要怎么持续下去。玛雅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 12 个小时。自从她的班机飞越了爱尔兰海岸，她就一直觉得坐立难安。飞机下降至 9000 米的高度之时，她已开始期待詹弗兰科的碰触。不过，等到他们终于见面，紧紧拥抱了 8 分钟之后，这对情侣已别无选择：他们该出机场去开车了。

人生中有一种说来古怪、但终究颇为恰当的现象。在我们满怀激动地与心爱的人重逢之际，人生却总是要为我们的情感关系投下一大障碍：也就是必须缴付停车费，并且在立体停车场内找寻出口。

话说回来，我们在毫不留情的荧光灯底下努力维持文明有礼的表现，也许会因此想起我们当初踏上旅途的原因：借此让自己能够抵御世俗生活经常造成的庸俗而愤怒的情绪。

停车场的粗暴环境——水泥地上布满胎痕与油渍、停车位旁到处可见被人遗弃的推车、天花板回荡着关门声与汽车加速的声响——正激励着我们坚定决心，避免再次落入我们最糟的一面。我们也许会这么祈求我们的度假地点：“请赐给我更多的宽

容，减少我的恐惧，让我永远保有好奇心。请在我和我的困扰之间设置一道屏障，把我的耻辱驱逐到大西洋的另一边。”旅行社与其只单纯询问我们想去哪里，还不如问我们希望怎么改变自己的人生。

认为旅程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预示，是宗教朝圣的一项关键要素，认为外在世界的旅行能够促成并强化内在的变化。基督教神学家对于朝圣之旅所带有的危险、艰苦以及花费丝毫不觉苦恼，他们认为这些表面上看似不利的元素其实是一种机制，能够让旅程背后的宗教意图更为鲜明。阿尔卑斯山上大雪覆盖的山隘、意大利外海的风暴、马耳他的盗匪、奥斯曼帝国的腐败守卫——这些考验都有助于确保这趟旅程不会轻易遭到遗忘。

不论航空旅行的普及与便利有哪些效益，我们仍可能咒骂这种旅行方式颠覆了我们企图通过旅程而深切改变人生的做法。

8

该是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的时候了。在通往索菲特饭店的走道上，我被一名机场员工拦了下来。他正在针对初抵希思罗机场的旅客进行意见调查，要求受访者表达自己对第五航站楼的印象，包括标示、照明、饮食乃至证件查验的过程。意见表上把满意程度划分为零到五，调查结果将纳入希思罗机场总干事下令办理的内部稽核活动。面对这份异常冗长的意见调查表，我心中不禁浮现一项疑问：市场调查人员虽可接触到深富影响力的当权人士，却极少要求我们省思人生中真正令人深感困扰的议题。按照零到五的满意程度回答，我们对自己的婚姻有多么满意？对自己的事业觉得如何？是否能够平心接受自己终将告别人世的事实？

我在饭店休息室里点了最后一份免费招待的总会三明治。今天飞越头顶的飞机特别嘈杂——中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贝鲁特的空中客车起飞之时，服务生甚至大喊了一声“拜托！老天帮帮我们吧！”而把休息室里仅有的两名用餐客人吓了一跳，其中一人是我，另一人则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生意人，正准备前往加拿大。

我只怕自己不会再有理由离家远行。作家要把视野拉到家庭生活以外的事物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梦想着自己是不是有可能以作家身份进驻现代生活的其他重要机构——银行、核电站、政府机关、老人之家——而且撰写的作品能够一方面报道世界的现状，同时又能保有不负责任的评论，以及充满主观与微带乖僻的特质。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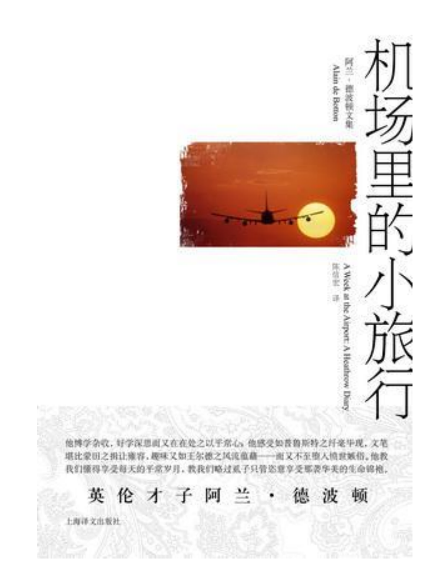
在入境大厅里，每一位旅客的旅程都即将告一段落；但在他们头顶上，出境大厅里的旅客才正即将踏上新的旅途。来自孟买的 BA138 号班机已转变身份，成为飞往芝加哥的 BA295 号班机。机组人员四散返家：机长开车返回汉普郡，事务长搭火车回布里斯托尔，负责上层客舱的乘务员已换下了制服（也因此卸去了原本的耀眼光芒，就像没有穿上军服的军人一样），即将返回位于里丁的公寓。

旅客在不久之后就会忘却自己的旅程。他们将回到办公室，而必须以短短几句话概括一座大陆。他们将再次与配偶及孩子争吵。他们将望着英国的景色而毫无所感。他们将遗忘自己在伯罗奔尼撒看到的蝉，以及共同涌现的希望。

但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再次对杜布罗夫尼克与布拉格产生好奇，并且重新感受到海滩与中世纪街道的魅力。明年，他们又会想到该去哪里租一栋别墅度假。

不论是什么，我们都不免忘记：读过的书、日本的庙宇、卢克索的陵墓、航空公司柜台前排队的队伍、我们自己的愚蠢。于是，我们又会逐渐把快乐寄托于家乡以外的异地：一间窗外能够眺望港口景观的旅馆房间，一座号称埋有西西里殉道者阿加塔遗骸的山顶教堂，一栋四周围绕着棕榈树的小屋，附有免费招待的自助晚餐。不久之后，我们又会再次想要收拾行李，想要盼望，想要尖叫。再过不久，我们就又必须重新学习机场带给我们的重要教训。

（该书的封面和右侧的书目基本信息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933087/，文章节选自《机场里的小旅行》一书）




作者：阿兰·德波顿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副标题：A Heathrow Diary

译者: 陈信宏

出版年: 2010

定价: 25.00元

ISBN: 9787532751549

【回到目录】



# 10-8 潘国灵：解构地下铁


潘国灵：香港作家、文化评论人

> 以往地铁站仅被视为一条人流输送带的年代已经过去，地铁二十五周年的口号“联系交通，更联系生活”正好道出这点，唯有在空间上入手，才可使一个交通网络，附加生活场所的意义。个中变化，与香港后现代商品发展逻辑密不可分。

## （一）从时间转向空间

一个女子在手机通话中向男友撒谎，说自己身在美术馆，但原来她正在地铁站中，与同在地铁站的男友撞个正着，镜头拉远，原来地铁站真有几分美术馆 feel，这是新近一个地铁公司官方广告。跟八十年代家传户晓的地铁广告“话咁快就到”（还记得广告里那一捺风吗？）相比，其间明显看到由时间至空间的轴心转向。

时间，或者说速度，是现代性的，功能性的，曾几何时是作为城市新事物的地铁所标榜的，而现在，当速度已成为基本要求时，在这个品味消费年代，打造空间已经成为一个新方向。以往地铁站仅被视为一条人流输送带的年代已经过去，地铁二十五周年的口号“联系交通，更联系生活”正好道出这点，唯有在空间上入手，才可使一个交通网络，附加生活场所的意义。个中变化，与香港后现代商品发展逻辑密不可分。

### 媒体化

今天，说地铁站是一个媒体浴场，并不为过。地铁站的媒体化，九十年代来了一个大跃进，这跟广告物料技术的发展相关，随贴随剥巨型广告画的技术突破，将地铁站带入我称之为“墙纸广告”的年代。当然，这跟九十年代消费主义抬头息息相关，但物质与文化的关系，也不容忽略。

在“前墙纸广告”年代，地铁站基本上无景观可言，不同的颜色与地铁的搭配主要是功能性的（识别作用）。现在，甫从地面走进地铁站，你即被重重的广告包围，沿电梯两侧的小幅广告只属小儿科，更令人晕眩的是覆盖墙身、柱体、车厢的广告画、月台上一整列或动或静的广告，已达无孔不入的侵入（intrusive）程度。发放“资



讯”的电子屏幕不断增生。电子媒体外，又有免费刊物派发，如果以往的《招职》、《去街 Guide》只是借地铁站作散发点的话，二〇〇二年推出的《都市日报》便是一份地铁刊物，像欧美地铁刊物 Metro（英文名字也一样），成了不少上班族的精神食粮。地铁站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广告平台，及“资讯”发放的多站据点。屏幕的增生、广告视觉元素的过剩（excessive），都是后现代社会的景观特征，香港地铁站是后现代景观的缩影，比起世界不少大城市如巴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商场化**

地铁站也再不只是乘客穿梭往来的瞬间站台。近年来，地铁站空间，特别是中环、尖沙咀、旺角等黄金旺站，有明显的商场化转向。地铁打造它们独有的 mtrshops，标榜“生活消闲一刻”，于地铁站内我们可以找到速递公司、面包店、便利店、西饼店、银行、汽水机、快餐店、咖啡店。地铁公司标榜“名店逐一进驻”，招标的商店种类，包括潮流服饰及精品、保健及美容产品、运动用品、激光视盘、旅游服务、修鞋配匙、电脑软件及配件、外卖饮食。其中，星巴克咖啡店的进驻最具象征意义，它正式标示着地铁空间，由过客空间转变成可以停驻歇息的空间。但地铁站作为商场，本身就带有矛盾性，它人流量高，但流动的速度也高；从交通角色考虑，人群不宜集结，但站在商户利益角度，能够吸引你多留一会才是好事。结果，这种过渡商场便诞生出矛盾的宣传语句：“生活消闲一刻”（消闲本来就不应是一刻吧），对于行色匆匆、惯于忙里偷闲的香港人，这语句却道出香港人的矛盾特性。

**品味化**

曾几何时，地铁夸示的是其功能性强项：速度。看看其名字：Mass Transit Railway，大量的运输铁路，本来就极之功能化，无甚感性可言（不同地方的地下铁有不同称呼，譬如台湾叫捷运、巴黎叫 Metro、伦敦叫 Tube，香港名称与新加坡 MRT 最接近）。但进入后工业社会，单单夸示现代化功能，已然不足。服务性行业、高科技商品（地铁也是 high-tech 交通工具），都汲汲于打造感性的软性形象。

多亏了几米，一向予人冷漠感觉的高科技交通工具，被扭转成感性浪漫的符号，攀登前所未有的温情指标，足见大众化绘本的普及力量。香港的地下铁亦捉紧时机，推出几米地下铁纪念品，并“食住条水”，自行推出”小克 crossover 地铁”绘本（又是 crossover），炮制于地下铁暗生的情愫。



品味空间的打造，亦见于地铁站的空间艺术化——除商业广告外腾出少量空间展出画作及艺术品，又在某些地铁站展出“社区艺术作品”，强化社区形象，予人一种更人性化的味道。当然，艺术感的经营是相当规范化的，譬如说，反映年轻人文化的纽约地铁涂鸦，在香港若不是被视为破坏行为，就只能是被商业收编的行为。巴黎地铁的流浪艺人当然也是看不见的，自然也没有它的乌烟瘴气。

反过来说，一些潮流商店，在命名以至装潢设计上，都以地铁站为模彷对象（譬如米兰站、法国站、重庆站等），这多少亦反映出地铁站超越纯功能性，成为时尚指标。

拉阔来看，由速度至空间的轴心转向，除地铁之外，亦可见于两“大”快餐店；快餐店最初就是标榜其速度的（此之谓“快餐”），但近年快餐店的翻新设计，明显是空间品味的提升，如杜汶泽所言：“系时候有更高既要求。”这种转向，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由现代性过渡至后现代性的表征。新的大家乐广告以地下铁为场景，看来便并非偶然。

我们当然知道，这种品味感性离我们的真实地铁生活甚远。真实的经验是，地铁很挤、人们你推我撞很没礼貌、人们无精打采神情冷漠，但商品的形象打造，从来不需要符合现实，正如几米于澳门举办的展览名称——方寸中的梦想飞行，后现代商品必须令人有梦想的空间（超出纯功能主义），即使你明明知道它是骗人的。

**（二）流行文化的地下铁想象**

地下铁作为实物以外，也提供我们不少文化想象。深圳地铁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廿八日通车，传媒镜头所见，试搭乘客都一脸雀跃。曾几何时，这种对城市新事物的兴奋，香港人也有过。

**由时间至空间**

通车不久，地下铁已被写入香港流行文化，最早的要算是八十年代初陈百强的《几分钟的约会》。这是一首地铁恋曲，歌词以地铁的速度写爱情的短促，像“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局，期望再会一秒钟”。如果数分钟只能划一个爱情的逗号，今时今日，老调重弹，却足够为爱情写上句号。且看看地铁公司推出的“小克 crossover 地铁”绘本的文字：“一段地下情发生于地下铁，一切都速来速往，正如交通工具本身”、“十五分钟内经历了爱情的整个过程”。所谓时空压缩，莫过于此。



一九八四年黄泰来导演的《缘份》，后段一场的“缘份游戏”，张国荣与张曼玉在地铁车厢与月台之间寻寻觅觅，以地铁表现 timing 的错失，同样着墨于时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列车车门其实是命运之门，开合，早一点或迟一点，人生大大不同。这样的题材，好莱坞电影有《缘份两面睇》（Sliding Door）。如果不分地铁还是火车，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盲打误撞》（Blind Chance）当然要算在其中。

后来，地铁于香港电影中渐见更空间化的处理，如电影《赌神3》里便以车厢格局炮制出一段少年赌神黎明与陈小春的精彩对打；当然还有后来《幽灵人间》被禁播的地铁闹鬼片段。

**由灰调至缤纷**

现代化的关键在于速度，加速意味着进步，但也是在无休止的加速之中，沿路风光掠目而过，人与人之间更形疏离。电影里的地铁映像，也多是灰调。

电影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法国新浪潮旗手戈达尔的《法外之徒》（Band of Outsiders）。女主角 Anna Karina 在地铁车厢中有感而发：“People in the Metro always look so sad and lonely”，紧接这话，镜头以高达式的跳接，特写几张地铁乘客的疲乏面孔，最后不无反讽地停在一个叫 LIBERTé 的车站。

近者较深刻的是米高曼导演、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同行杀机》（Collateral）。城市冷漠，汤姆·克鲁斯说即使有人死在纽约地铁，三十分钟也乏人理会，结果一语成谶，成了这个杀手的结局。

说到香港，我想起黄碧云一篇中篇小说《暗哑事物》，小说出现大量人物重叠，你可以是我，我可以是你，个人不如想象般独特，贯通的是地铁场景：“那一列装满尸体的地车，将残躯送回人们的墓穴，那个他们叫家的地方。”韩丽珠的小说《宁静的兽》也贯穿地铁意象，“房子建在地铁站之旁，总有隆隆的声音充塞其中。从窗口看出去，列车慢慢驶出，加速、晃动、消失，不断循环着这样的过程”，不期然在我脑海勾起王家卫《堕落天使》中杀手黎明住所与飞驰列车一窗相隔的片段。独立漫画则有智海在《香港春卷》中的地铁作品，将“sorry”与“疏离”重叠。

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你与我，大抵都有点疲倦了。

不过，现实中，地铁空间的确是愈来愈明亮化。不难发觉好些地铁站都换了新设计，盖顶伸长以遮挡风雨，砖头凿开以扩展玻璃范围，让更多阳光透射进来。影像上亦愈见缤纷。几米的《地下铁》自不用说了。绘本先后被改编成音乐剧（由台湾演到澳门；有趣在澳门根本没有地下铁，舞台演出成了一个纯观影经验）和电影（马伟豪



导演，梁朝伟、杨千嬅、范植伟饰演）。色彩斑烂的超现实地铁世界，从此不限于盲女双目，而变成跨媒体文化想象。有流行杂志以地下铁做封面故事，当大家开始怀旧怀到七十年代时，年龄不大的地下铁，已经进入怀旧行列，地铁通车成为七十年代怀旧事典必不可少的一项（地铁观塘至石峡尾部分最早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通车）。

地铁的浪漫化建构，电影《缘份》是开山作，新力军有《地下铁》、人气韩片《我的野蛮女友》（男女主角在地铁相遇）；张一白导演的《开往春天的地铁》，就更加看到北京创作人的新城市感觉，共同将地铁打造成感情的载体。

大众文化文本中，广告不可忽略。那个女友向男友扯谎说自己身在美术馆的广告固然是幽默例子。如果这是官方广告的话，麦当劳将列车变身 Graffiti 涂鸦、大家乐两男一女三人行方力申邓健泓于地铁站食饭盒的广告（虽是搭景），以至近期容祖儿取景于地铁车厢的可乐广告，都将地铁打造成一个年轻化生活空间，一除其灰调感觉。

**（三）地铁作为艺术空间**

说到公共艺术空间，在当今所有国际都会中，地铁都占一位置。

台湾有一位捷运迷叫杨子葆，长期投入捷运系统相关的研究与实务工作，着有《艺术进站——捷运公共艺术》（台北文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公民美学．公共艺术系列”之一）、《捷运就在邮票里》（专谈世界各地捷运邮票作品）、《世界经典捷运建筑》等地铁专着。台湾对于公共艺术的触觉，在华人世界中走得比较前。读着杨子葆的《艺术进站》，令我反思自身城市的地铁艺术，到底发展得有多成熟。

二〇〇四年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主办了一个“都市神韵——艺术与公共空间国际研讨会”，其中有地铁发言人论及地铁公司支持公共艺术的角色。这要从一九九八年说起，这年，香港地铁公司开展“地铁车站艺术”计划，包括机场快线艺术计划、车站艺术建筑、地铁画廊、社区画廊、车站表演艺术、流动艺术、地铁隧道艺术计划七部分，当中容纳了中外名师作品（如纽西兰艺术家 Neil Dawson 的雕塑品）、巩固社区凝聚力的社区艺术作品等（如香港设计师何弢及北角区儿童创作的壁画）。

地铁广告说地铁站可媲美美术馆，但日常生活所见，鲜有乘客真的会把地铁站看成一个公共艺术空间。（说地铁站是公共艺术空间，当中亦存在一定“矛盾”，因为地铁空间是有专属物权的，不像露天的街道、天桥，但话说回来，即使是街道也不一定属于公共，像香港的“星光大道”，管理保养权便为新世界集团所有。）香港人对地铁艺术品的意识很低，你可以说，视而不见是城市人的特性，尤其在地铁这快来快往的运输带上。如果艺术品是需要停驻观赏的话，地铁的流动属性，本身便与艺术属性相



违。“大众想要涣散，艺术却要求专注。”本雅明说。这情况不独是香港所有，虽然香港人的脚步可能真是全世界最快的。

人们的艺术敏感度是一回事，艺术品本身的特性是一回事。在杨子葆的《艺术进站》中，我看到不少好的地铁艺术作品，都是建筑学上的，如巴黎地铁 1 号线的“罗浮－希留利站”，月台特色是彷罗浮宫石壁的月台壁面、展示罗浮宫收藏的复制品橱窗，还有与罗浮宫设计一模一样的座椅，又如“协和广场站”，设计师以印有字母、标点符号与数字的蓝白色陶片，在月台墙壁上拼凑出《人权宣言》的全文，来突显协和广场这个地方的特色。

这恰恰却是香港所缺乏的，我的意思是，地铁的公共艺术太重 fine art 味而太少建筑味。这正正是美术馆那个广告比喻的问题所在。我们需要的不是将地铁站变身传统画廊，而是融入更多更好的建筑美学，而现时地铁画作虽然不少出自名家，却完全与其空间属性脱离，就是放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未能真的做到艺术与空间两者有机化的结合，思维仍停留在以艺术美化环境，结果作品在乏人专注之下，只能退入背景真的与美化的墙纸无异。

香港地铁站的艺术味道，更浓厚的却是来自商业广告。曾经看过尖沙咀一个地铁站入口被粉饰成一个杯面广告站台，煞是有趣，如果你对普普艺术不反感，这也可算是一件装置艺术品。

因普普之名，香港地铁更堪玩味。最近，中环地铁站出现了一个大型的飞机轮子，游人经过莫不感到新奇，不时见游人拍照留念，这个轮子其实是一间速递公司的广告装置，我以为，把它看成一件装置艺术品，也无不可。当然，这个飞机轮子不是“正规”艺术品，而只是一个广告现成品而已。但这正正是吸引我游戈地铁景观之所在。

所谓地铁的公共艺术，不应只限于从博物馆走出车站的物理空间转移，还包括其特有性质的表现——地铁作为一个大型资本主义媒体场，好些别具特色的广告设计，包括铺满整列车卡的广告画、把地铁站装饰成观赏性不下于城市凋塑的广告装置等，都经常透现着重重的普普艺术气息，尽管它们快生快灭，转眼就是另番面貌。但这正正是香港特有的地铁景观，流露着香港的个性——商业与艺术互相紧扣、即用即弃、快起快拆，一种高度资本主义、资讯超载、拟像充斥的后现代城市气质，于地下空间中任意散发。搭地铁不像搭渡海小轮可以看海，但连绵的景观未尝不是一片符号海洋，我也许说不上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浪漫诗人，但也够我这彻彻底底的城市人徜徉其中，目不暇接，神思迸发。



（文章节选自《城市学——香港文化笔记》一书）

【回到目录】



# 【公共空间】

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市政中心除了那些游手好闲者以外无人光顾,他们除了那儿无处可去。商业中心只是那些标准化的郊区连锁店的翻版,毫无生气可言。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有漫步的人。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在表面之下,这些“成就”比它们可怜兮兮的表面假象还要寒碜。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规划行为应对周围地区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典型的情况是,这些被肢解的地区生发出快速增长的恶性肿瘤。为了以这样的规划方式来给人们提供住宅,价格标签被贴在不同的人群身上,每一个按照价格被分离出来的人群生活在对周边城市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对峙中。当两个或更多这样对立的“岛屿”被并置在一起时,就被冠以“一个平衡的街区”的美称。垄断性的购物中心和标志性的文化中心,在公共关系的喧闹之下,掩盖着商业还有文化在私密而随意的城市生活中的式微。

这样的“奇迹”竟然可以实现!被规划者的魔法点中的人们,被随意推来搡去,被剥夺权利,甚至被迫迁离家园,仿佛是征服者底下的臣民。成千上万的小企业被拆,它们的业主们就此被毁掉,却连一点补偿的表示都没有。完整的社区被分割开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做的结果是,收获了诸多怀疑、怨恨和绝望;这一切无法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法不相信。芝加哥的一批神职人员惊骇于按照规划进行的城市改造产生的结果,他们问道,当约伯写下以下文字时,他会是在想着芝加哥吗?

瞧啊,这里的人们就这样改变了邻居的地界……

把穷人赶到一边,密谋欺压那些无亲无故者。

他们在不是他们的土地上收获果实,在从别人那里夺来的葡萄园里

粗暴地把藤蔓折毁……

从城里的街道上传来阵阵哭喊声,街上躺着的遍体鳞伤的人们呻吟不止……



——摘自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 10-9 网易专题：60 年，从公家空间到公共空间

> 中国人的公众场所 60 年来历经流变,，从“公家空间”，到“公用空间”，再到今天“公共空间”的初步萌芽。我们开始明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在于其规模之大小，而在于其是否以人为本，服务于公众生活，不只是政治表达的工具。

顾名思义，公共空间就是属于所有公众的场所，无论男或女，老或少，穷或富。中国人熟悉的公共空间有广场、礼堂、街道、公园，等等。但公共空间不仅仅只是个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进入空间的人们，以及展现在空间之上的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包括公众自发的日常文化休闲活动，和自上而下的宏大政治集会。

1978 年以前，在中国人的公共空间里，主导的人物是领袖、干部和群众，压倒一切的活动内容是宣誓、口号和报告。那时候的公共空间，其实只是“公家空间”。改革开放以后，在公园、街道等“公用空间”里，群众的自发性活动开始回归，而且花样繁多。进入新世纪，中国各个城市中规模宏大的广场遍地开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缺憾，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却从虚拟网络中抽出最稚嫩的枝芽。

### 公家空间：政治集会的场所

1949 年以前，宏大的公共空间十分罕见，纵有一些公共表达的活动，大街是更加常见的场所，如 1919 年的五四学生运动、1947 年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这一切在 1949 年得到彻底改变。建国前后，随着中南海被确定为中央政府的落脚点，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的修缮、扩建就破土动工了。浩大的工程之后，在原来的帝王宫殿之前，赫然出现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巨大广场。

在首都的规划问题上，苏联专家最终战胜了梁思成等本土学者。天安门广场附近拆旧建新的规模越来越大，更多宏大建筑矗立起来，如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等等。连同修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这里成了整个国家的



“公共空间”，见证了 60 年以来每一次的重大政治活动，例如开国大典、五次国庆阅兵、文革时期的大接见等。这里是中国人“公共空间”的典型，所有的活动都是有组织、目标明确的。公共表达也是整齐划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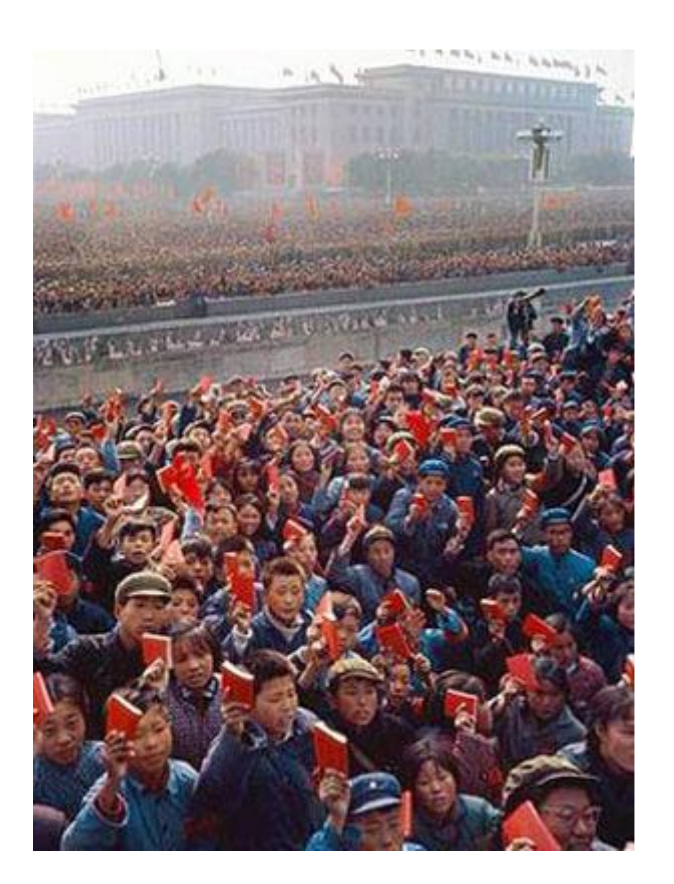
在远离首都政治心脏的地方，宏伟的广场暂时还难以复制。革命政治功能的载体，于是被各式各样的“礼堂”所取代。甚至在偏远落后的乡村，顶上一颗硕大红五星的礼堂也并不少见。工人、农民、学生在劳作之余，“集中”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仪式，




广州的小洲人民礼堂。



50 年代大规模建设后的天安门广场。



1966 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公用空间：公园里的百姓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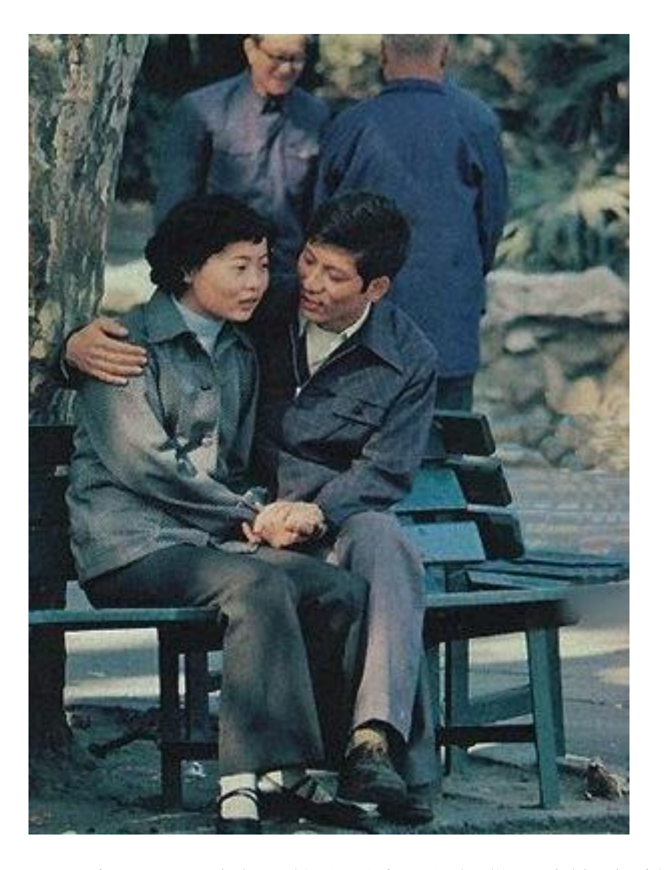
1978 年之后，自上而下的政治集会越来越少，广场和礼堂里的政治仪式也慢慢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褪去。群众空间逐渐拥有一定的自主性，成为“公用空间”，比如城市里的公园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很多在史无前例期间遭到破坏乃至关闭的公园，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例如北京市的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于 1971 年 2 月关闭，1978 年 3 月重新开放。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们成群聚集在公园里，不再是为了某种事先规划的政治活动，而纯粹是个人化的散步聊天、唱歌跳舞、交友恋爱。

更难能可贵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活动”已经开始出现了。在当代中国艺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星星画展，就是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办。北岛领衔的《今天》群体，在玉渊潭公园连续举办了两次诗歌朗诵会，一次虽然天气不好，依然有四五百名观众，另一次则有近千名。作为民刊的《今天》，还曾在紫竹院公园举办过一次作者与读者的见面会。这种具有公共空间属性的活动不仅空前，而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有绝后之势。

即便是主题和过去并无二致的政治集会，公共表达也开始出现个性化的内容。



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在政府组织的天安门游行活动中，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据称这完全是学生的自发行动。标语的内容虽然还是和领袖有关，但已经变成了对话式的问候，而不是膜拜式的万岁。在这张著名的照片上，大学生们潇洒的步伐、自由奔放的笑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对那个开放年代的重要记忆之一。



1978年之后，城市里的公园给人们提供了谈情说爱的空间。




星星画展1979年开展，被称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起点。



1984 年国庆，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

**公共空间：期待从网络走进现实**



**礼堂的消失**

从 1990 年代开始，“商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大潮，所有的东西都要为之让步，包括曾经最为神圣的广场和礼堂。不消说，各式各样的礼堂早已褪去了政治的功用，尚有利用价值的，变成了歌舞厅、录像厅、展览馆，而小城镇的礼堂大多在岁月的风雨中日渐衰败，终至坍塌。就连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商业的身影也随处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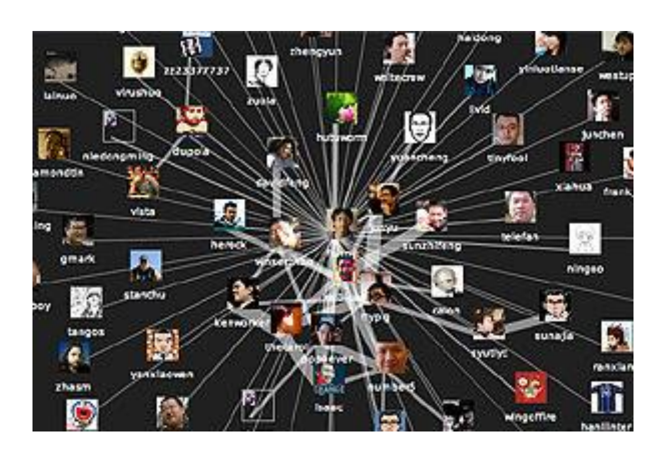
国家引导并培育了人们对商业的热爱，人们的公共意识也在同步消退。在改革开放之初，非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严肃的问题，而到了今天，人们都退回了自己的领地，这样的问题甚至连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了。



**“新广场”遍地开花**

受惠于经济的腾飞，大到人口上千万的大都市，小到几千人的村镇，形形色色的“新广场”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它们的名字叫“人民广场”、“市民中心”、“城市广场”，不一而足。好像一场新时期的跃进比赛，它们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巨大。

然而，这些地理名词上的“公共空间”，与公众活动大多数处于割裂状态。一方面，其政治功能弱化，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承担浩大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公众自发的文化、休闲活动也很少在这些空间上演，更别说公共表达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广场弥补了中国城市缺少公共空间的遗憾，却大多流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与民众的生活无关。



**公共空间的雏形在虚拟空间出现**

在现实的空间成为公家空间、公用空间、唯独没有成为公共空间的时候，从论坛到博客再到邮件组，直至今天的豆瓣、饭否和 Twitter，虚拟的公共空间开始出现。网络上的互动极其活跃，而且还推动了现实中公共空间的成长。各种网友聚会打破了年龄、职业和地域的界限，更多的是精神认同，而非外在的身份认同。

近年来公民社会的成长，得益于网络的十年培育。从最初触目惊心的话语暴力到

“打酱油”、“躲猫猫”，说明公共空间的话语规则逐渐形成。从虚拟的公共空间，到现实中的公共空间，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也有可能是一道天堑。即使是天堑，迅速成长的公民们也终将跨越。

**结语**

中国人的公众场所 60 年来历经流变，，从“公家空间”，到“公用空间”，再到今天“公共空间”的初步萌芽。我们开始明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在于其规模之大小，而在于其是否以人为本，服务于公众生活，不只是政治表达的工具。

而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空间的涵义更加广泛，它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他强调，在公共空间内，公民间的交往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以公共事务为话题的“公共交往”。显然，我们距离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还遥远。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 10-10 刘冉：门为谁“常开”？


刘冉：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

> **新政府总部的设计乃至香港现行的城市规划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与理念的限制，因此对已有空间的利用与活化、对未来空间的开拓与占领，将会是在空间的掌控者与使用者之间不断发生的角力。**

九月七日晚，数万黑衣香港市民包围位于添马舰的新政府总部。

与金钟地铁站相距不过五十米的政府总部，此刻却仿佛遥不可及——几乎所有反国教运动的参与者都花了超过半个小时才抵达集会地点。仍在纷纷赶来的市民们讶异地发现，金钟站 A 出口地面层的海富中心商场平台早已水泄不通；数千人在夏悫道南侧的人行道上淤塞，等待通过一部手扶电梯、一部直升电梯和一部楼梯上到天桥，才能跨越这条宽约四十米的六车道快速通路，抵达政府总部。而另外一条路径，则需要下到夏悫道南侧的机动车辅道、向东逆行几十米、向南横穿数条机动车道、翻越一道铁栏杆，才能找到两百米外的另一座天桥，跨过夏悫道走到中信大厦，而后落到地面、接近政总。

这并不是半年前才启用的新政府总部第一次暴露其难以容纳公民运动的缺陷。

香港大学博士生李颖春起初对新政府总部印象不错：“建筑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形象，上面又铺了草地，据说是专门选择的品种，让人可以踩上去。”然而今年七月一日首次以新政府总部为终点的大游行，却让她大感失望。下午两点开始在维园集合的游行队伍，直至夜晚七点才终于见到政府总部；在街道上阻滞了近五个小时的人群，又在夏悫道南侧拥堵起来，等待警察分批放行。“几万人的游行队伍突然停下来等红绿灯，这是多么可笑的感受？”更没想到的是，政府总部东翼门前的小广场迅速饱和——依照设计，这里的最多能够容纳两千人；而在警察指引之下依序前行的溢出人群，本以为能够进入添马公园聚集，却发现自己竟然一路走回了地铁站！哭笑不得的李颖春听到身旁的人也在一头雾水地纷纷询问：“什么？我们就这么出来了？游行就结束了？”

首次以新政府总部为终点的游行，却最终失去了终点和目标。就读建筑系的李颖春敏感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这个空间的物理尺度够大，但它的分割方式使它不具备公共性。"

反国教大联盟发言人叶宝琳则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很简单，第一希望群众能比较方便地来到政总，第二希望有群众聚集的地方，第三希望我们的示威可以 reach 得到政府官员。就这三点来说，新政总都是不够理想的。"

**难以跨越的夏悫道**

并不是只有李颖春想到从建筑学视角看待政府总部的公民运动。亲身参与了九月七日晚集会的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当晚便对政府总部的外部空间管理留下了"狭隘、自闭、贬损公民尊严"的印象。其后几日，他连续观察政总在非集会时段的正常使用，而后指出：政府总部在连接金钟城区与海滨区的行人交通上存在根本缺陷。"政府总部的宏伟造型象征着'门常开'，但广大市民却很难走进来。"

当横贯港岛东西的夏悫道将政府总部与金钟城区彻底割裂，唯有靠地下与空中的行人交通设施才能将城区人流引入政总。咨询阶段的设计图中原本有四座行人天桥，除现有两座分别连接海富中心与中信大厦之外，另有两座拟建天桥连接至夏悫花园和商业核心区。然而完工后的政府总部，夏悫道上仅有孤零零一座 O 型天桥，仿佛一只庞然巨兽被扼住了咽喉；一旦出现人数众多的游行集会，必然造成人流阻滞，成为绕不开的交通瓶颈。

政府总部项目设计者、著名香港建筑师严迅奇表示，设计图中的两座拟建天桥是出于长远考虑，如有机会应当修建，只是需要与落脚点建筑的业主再行协商。而从地面直达政府总部已经不可能实现，"我们只能在先天的条件限制之下尽量做到方便。"

同样被快车道割裂城区与海滨的中环与湾仔区，除密集的行人天桥外，更借由地下通道来弥补步行无法直达的缺陷；但从金钟地铁站和巴士中转站到政府总部，竟没有一条地下通道可以穿过夏悫道。严迅奇告诉记者，设计中有在政府总部背面留出地铁出口的位置，但仍需政府与港铁公司协商决定。

然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交通事务委员会在 2003 年 5 月 27 日的"添马舰发展项目与公共交通服务"文件中称："地底建有任何车站及铁路线路，都会对上盖的政府总部大楼及立法会大楼构成极高威胁，故此，一开始便应尽量避免这类地底的重大设施。" 这一决定也适用于未来的沙中线：九广铁路公司曾在沙中线建议书中提



出将金钟转乘站设于添马舰南部的“政府、机构和社区用地”，亦即建成后的政府总部背面，但同样出于安全顾虑被政府否定。

朱涛则质疑政府的这一思路是否属于本末倒置：“添马开发，首要在规划上需解决的是城市意义上的金钟—添马地块步行的顺畅连接问题，其次才是建筑意义上的政府总部大楼的平面布局问题。”也就是说，理应由政府总部为地下通道让路，而非待建筑设计方案定型之后才将修建地下通道的可能性彻底排除。

尽管夏悫道上的一座天桥似乎足以满足平日里的人流需求，然而在政府总部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结点附近，示威游行是市民常规的空间实践形式之一。因此，政府理应考虑到游行示威人流的步行便利性与可达性，而非将其视为一种非常态需求，只给予临时敷衍。

**示威能量的分割与消解**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项目协调员施德安是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研究者，根据他的观察，过去的游行路线有一个逐渐升级与积蓄能量的过程：“从维园一路走来，最后抵达旧的政府总部，中途不断有人加入；从皇后像广场开始的集会，也能够随着运动升级而向两侧延伸。现在，这种‘立法会—政府总部—礼宾府’式逐渐升级的情况不再适用了。”当一路高呼口号的游行者从维园步行前往添马舰，却被车流挡在“常开”的门前，俯首帖耳地等待上天桥或是警察放行，这无疑是对游行热情的一种戏弄与消解。

那么，海滨长廊修建完成之后，是否可以成为游行路线的一部分？

事实上，示威游行是个体能量逐渐积蓄成为群体能量的过程，势必要求人群与城市街道存在积极的互动。从维园出发的游行队伍，倘若一路走到海边，再沿海滨公园抵达政府总部，那么整个游行过程将会被海滨的高度干道隔绝在整个城市之外，失去与街道密集空间与行人的频繁互动，进而丧失一路积蓄能量、至政总到达高峰的可能。

而终于抵达政府总部之后，人群又被分割在政府总部门前（公民广场）、立法会广场及添马公园之间的小块空间里，中间被建筑阻隔，彼此难以交流呼应，甚至很难感觉到有多少共同参与者。面积最大的添马公园，并非直接面对政府总部大门；公民广场则难以容纳上万示威人士。李颖春对此也表示不可思议：“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居然没有一个让公民可以堂堂皇皇在政府总部前面集合的地方。”

据叶宝琳介绍，目前康文署并不允许租借添马公园，理由是海滨长廊尚未完工；而政府总部门前广场也仅限周日可以用来示威。“我们都觉得好惊讶，为什么作为政府总部的一部分，添马公园不能借场？政总和立法会广场只能容纳几千人，是不是以后上万人的集会都不允许？”后来，随着反国教参与人数越来越多，警方不得不作出让步，开放添马公园和添美道用于疏导人潮。事实上，九月一日下午在添马公园举行的音乐会，也是在违反公安条例的情况下擅自转移的。

对此，严迅奇告诉我们，政总的设计过程中有充分考虑到群众集会的空间：“很明显，政府总部一定要有场合给人表达意见，有时是示威，有时是庆祝，所以前面的大草地可以给人聚集，来表达不同的情感；政府东翼前面和立法会的广场也都是示威区。至于怎样控制和开放示威区，这个是政府管理的问题，就不是建筑师能够控制的了。”

事实上，新政府总部对社运人数的容纳度是远胜过旧立法会与旧政府总部的。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指出：“空间设计与政治体系密切相关，殖民政府恐惧市民进行政治动员，就会有意识地压缩公共空间。以前礼宾府旁边就是一条马路，是没办法集会的；政府总部也被围栏围住，没有空间让你进去；立法会外面的皇后像广场，大部分空间是水池和花草；西环的中联办门口，小小的空间也种了花。现在的政府总部，空间虽然零碎，但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政总聚集的人群，能够被看到、被听到吗？

叶宝琳认为，原先示威者只要有一万人就可以包围立法会，确保议员听到市民的声音；而如今没有五六万人，是不可能把这个庞然大物包围的，这大大提高了集会中群体效应的门槛。此外，由于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都有独立出入口，民众无法与他们形成实质交流。“好像面对荒山野岭，处处高墙，官员都不知道从哪里出入；你在外面喊他们也听不到，在门口等他们又不会出现，到底这样示威有什么意思呢？”

严迅奇坦然承认，这在设计中是有考虑到的。“我们的想法是，市民从金钟走到海边，尽量不要影响政府的运作。例如市民能够看到立法会大堂和餐厅，跟议员会有视觉上的交流，但不会干扰到他们的日常工作。就设计而言，各方面的利益都要考虑到，不能混乱，这是没有办法的。当然，如果想要方便民众和记者进入，在管理上肯定做得到。”

然而在施工过程中，为满足立法会的要求，餐厅一侧还是被水泥高墙挡住了。很少有人发现，那一堵光秃秃的白墙之后，竟然还藏着一角荷花池。



**反国教：政治空间的活化**

起初，在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反国教集会现场，音响设备的安排尚不完善，各个角落里都有许多参与者听不到来自主舞台的声音。此时，人们架起了小小的麦克风，各自围成一圈，唱歌、弹琴、谈天；也有人带来数台投影仪，将高大而冷漠的水泥墙转变为鲜活的画面。

集会参加者、香港独立媒体特约记者易汶健如此描述："在户外草地办音乐会，气氛极好；公民广场虽窄，但人们可以在后面的马路就地坐下；升降机外面的玻璃变成了民主墙，贴了不少海报；有些空间上方有遮蔽，也更适合搞多样化的活动。"

面对这种场景，叶宝琳为之动容："这种感觉是组织者做不到的，要靠参与者主动建立起人与人的沟通，效果也更加感动和有趣。"

曾任香港大学建筑系执行主任的美国建筑师 Jonathan D. Solomon 认为，政府总部与城市的割裂确实很少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政府建筑上，但香港市民对公共空间的占领与活化能力也令人惊叹。"在香港，市民与地面的关系耐人寻味。添马政府总部原本可以与城市连结得更好，但考虑到最近发生在这里的反国教运动，我要说，它模糊的空间安排反倒为公共领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与不同寻常的场地。"在行动升级的过程中，市民克服了空间对运动的限制，逐渐占据了原本不被视为示威区域的场地，最终对"门常开"形成包围之势。

香港文化评论人小西则指出："人文地理学中有一对概念：'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或许可帮助我们把握新政总落成以来在空间上的意义转化。简言之，当人们通过命名或活动赋予'空间'以意义，冰冷的'空间'就成为了具人气的'地方'。"就此而观，学民思潮发起的占领新政总行动，具有点石成金的意义。"在新政总门口聚集的市民并没有抵垒即散；与此相反，他们成功占领了新政总门外的马路、立法会门外的空间以及添马舰公园，以身体改变了空间的意义，将'空间"变成了'地方'。9 月 1 日在添马公园举行的大型集会上，当压轴的达明一派面向'门常开'唱出经典歌曲《天问》时，高高在上的新政总跟市民之间的强烈空间对比，颇具戏剧性地突显了官民的对峙。可以预计，新政总的公共空间将会由此转化，类似的行动将会陆续有来，学民思潮的占领行动变相成为了新政总的'开光'仪式。"

叶宝琳也告诉我们："将来一定会有更多活动发生在这里。记忆和经验是要逐步建立的，无论多么冷冰冰的建筑，也可以被人的行动活化起来。"



然而，尽管市民具有活化建筑与空间的能力和意愿，但作为一个标榜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香港的城市空间设计，仍有其天然不利于市民在地面上行走的缺陷。“门常开”，却开向了大海；真正供香港市民日常出入的门，却是一个悬在半空的隐蔽后门。而这一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新政府总部身上。

**悬在半空的政治空间**

“政府总部体现出一种心态，那就是政府非常漠视市民在地面上步行的意义。”朱涛忧心忡忡地说。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在其名篇《漫步城市》中指出，感知城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制高点整体俯视城市，另一种是走入街道、体验城市的机理和质感。行走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赋予市民选择与转化空间的权力；而由技术官僚统治的城市，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特别单调的城市规划。能够在地面上行走，是一种基本的空间政治权利。

密集的城市街道形成生机勃勃的街道生活。人在道路上的行走，不是简单的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交通，而是一个过程。而越来越多的狭窄天桥与吞噬着街道的庞大商场，正在抹杀这个过程的涵义。小西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与文化转向的夹击下，香港的城市空间是愈来愈干净，愈来愈单一，愈来愈中产阶级化或曰’仕绅化‘。城市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不再是生活的空间、游戏的空间、市民交流的空间，消费成为唯一被允许的活动，用国际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t International)的话来说，那是奇观社会（Society of Spectacle）中的更彻底的‘异化’。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刻薄却一针见血的描述曾引发美国城市规划的整体转向：“……市政中心除了游手好闲者以外无人光顾，因为他们无处可去；商业中心只是标准化的连锁店翻版，毫无生气可言。人行道不知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漫步的人；快车道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垄断性的购物中心和标志性的文化中心，在公共关系的喧闹下，掩盖着商业和文化在私密而随意的城市生活中的式微。”而在香港，政府似乎并未意识到空间规划的重要性，一切仍是以效率为先。

香港市民对空间的活化是自发而灵活的，他们创造性地以个人和集体行动赋予死空间于活力。然而更大尺度上结构性的城市规划危机，若指望市民凭其个体力量的汇聚来来全面克服，未免太过浪漫。当城市的大片地面步行系统在规划层面遭到破坏，从而形成结构性的创伤，要想靠市民在局部自发“活化”，几乎不再可能；唯有规划



与政策层面的转变，才能挽救逐渐消弭的城市街道，以及市民在地面上悠然行走的权利。

朱涛指出，“现在香港的问题是一下子批几十个街区给开发商，导致街道被吞掉，形成一个商业中心，人都从地下和天桥走，很难从地面通行；从地下一出来就进了商圈，街道文化就被毁掉了。产权归开发商，一切设施就都是商业逻辑的。”因此，他认为，应该从城市规划法规上严格限制街区尺度，保证公共街道的网络密集程度。“就像曼哈顿的规划法规一样，开放商不得利用庞大楼盘覆盖多个街区——这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结语**

悬在半空的，是建筑，是空间，是市民行走的路径与政治实践的权利，也是技术官僚不接地气的思维方式。对美国五十年代的城市更新运动，简·雅各布斯曾有一句赤裸裸的批判：“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带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却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秩序。” 新政府总部的设计乃至香港现行的城市规划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与理念的限制，因此对已有空间的利用与活化、对未来空间的开拓与占领，将会是在空间的掌控者与使用者之间不断发生的角力。

反国教运动迅速建立起的集体反抗记忆，已开始将悬在半空的“门常开”拖回地面；而悬在半空的香港政治空间如何才能踏到实地，将是摆在官员、建筑师与普通市民面前的一道更加艰难的议题。

（本文原载于《阳光时务周刊》第 27 期）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王菡，刘垚，胡馨以

设计： 潘雯怡

校订： 方宜农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论坛（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版权声明：一五一十电子周刊所选文章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所有使用都请与原作者联系。